

# 独立阅读

##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 2010年9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 6、更多即时信息，可见：<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扬克、孙骁骥、灵子

**轮值编辑：**汪伟

**观察员：**文学：朱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夏佑至（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

**翻译：**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 编者按：

古老的洪堡大学坐落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学校对面的倍贝尔广场被国家歌剧院和圆顶的圣海德维格大教堂所包围。一块不大的玻璃镶嵌在广场地面上。透过这块玻璃，可以看到地下一排又一排白色水泥书架。这些书架可以容纳 2 万本书，却永远空空荡荡。书都到哪里去了呢？

书都到哪里去了呢？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焚书博物馆的时候，一定想到过这句话。书被纳粹烧掉了，就在洪堡大学门口——黑格尔和爱因斯坦都曾在这里任教，它是也是海涅、俾斯麦、马克思、恩格斯和 29 位诺奖获得者的母校。被烧的书里有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的著作，戈培尔认为，他们的精神是“非德意志”的。

烧书只是极权政治控制思想和言论的象征。对一本书来说，最常见的惩罚是禁止阅读——正如渭南警方对谢朝平的《大迁徙》所做的那样。烧书和禁书让一个国家变得愚蠢。没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恐惧将成为生活的常态，有些书就永远不会面世。它们是死于腹中的胎儿；你永远无法想象一种可能的美，不能想象一本没有写出来的书如何影响世界——在所有的损失里，这个损失是最大的。

## 来函：

Dear Friend:

连续两期您都介绍美国宪政，补充点材料：

1、国内的一个腕是南京大学的任东来，他是研究美国宪政历史的博士，可以请他写一些介绍文章。

约翰·马歇尔与美国现代法治的确立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418>

免费下载：美国最高法院（麦克洛斯基）.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370002.html>

2、有一个关键人物：约翰·亚当斯

我发现很多写美国历史、宪法的文章都把这个人给忽略了，他很重要。

08 年美国有个电视剧：John Adams，您可以找来看看。

3、北大出过一有本很浅显的美国历史教科书：《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关于美国由邦联到联邦的阐述很详细。

（印象很深的是北美早期劳动人民去世时的财产清单：东西再少也有一本圣经！）

谢谢！

Best Regards,

Chen Shi

Chen Shi: 您好！

任东来先生的大部分译作、著作和《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均已置于书架，有的已经拜读，受益多多，有的尚未来得及拜读。“独立阅读”无法提供稿费，基本没有主动约稿，因此有很多疏漏，尚祈见谅。

《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这次撰写《联邦论》的书评，专门把它找出，温习了美国建国前后的一段。

对于约翰·亚当斯，此前略知一二，但谈不上有深入了解。您说的电视剧，我去找一找，希望能找到。

非常感谢您补充的材料，这是对“独立阅读”最大的支持。

王晓渔

## 目录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经济: 苏小和

写作: 朱白

朱航满

思想: 成庆

文史: 王晓渔

艺术: 言一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德国 杨克: 德国种族主义在抬头?

日本 刘柠: “零增长”、“小日本主义”与“下流社会”

### 书评

---

孙传钊: 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二)

凌越: 你在下面, 不在反面

言一: 作为景观的田园

### 逝者·范用

---

王晓渔: 小学生的公共生活

### 随笔

---

夏佑至: 书的故事

### 音乐

---

马慧元: 切尔卡斯基轶事

### 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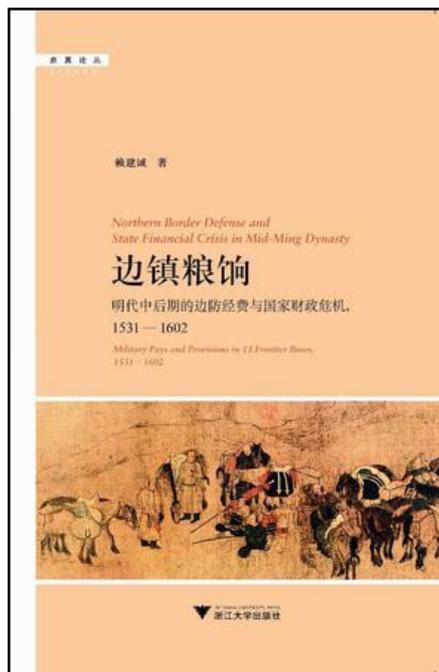
---

北方朔、贾葭、灵子: 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再访周有光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ECONOMICS&SOC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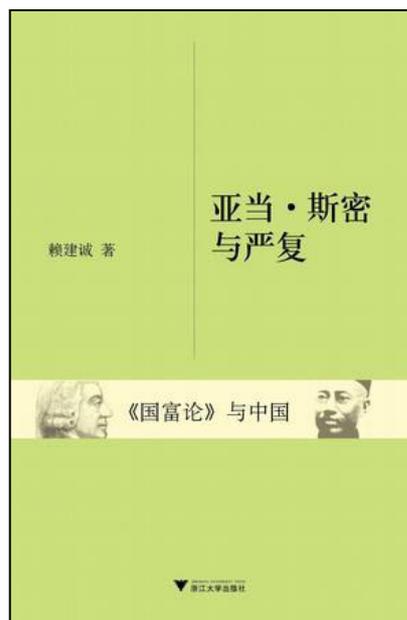
上个月我推荐了台湾学者赖建诚先生的《梁启超的经济面向》，引来热议。不仅大陆各大网站转载，海外如“观察”、“新世纪”也隆重刊行，其中原因，我想一方面是众人被梁启超 100 年前的经济思想所震撼，先人对常识早有把握，可叹这个国家迷途并不知返，另一方面，则是被赖建诚先生的大好学养折服。所以，这个月，我干脆找了赖先生的其他著作来读。

在我看来，《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 1531—1602》（赖建诚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8 月），是本很有意味的书。明朝败亡与财政败坏有关，而财政败坏的直接因由，是边饷剧增，有点像笑蜀同学说的维稳成本。赖先生提到的一个史实，是明朝中后期财政的压力剧增，主要开支，就是边防经费的支出，一度达到整个财政支出的 97.25%。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可怜的明朝皇帝怎么维持。这是史家共识，但是具体的情况与确切的数据，能深入讨论者不多。黄仁宇先生的《16 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算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但黄先生所援引的史料，多半集中在明朝官样文件，而赖建诚先生则依据的是《万历会计录》，以及诸多明代大臣学者记载的军马钱粮数据。可以说，黄仁宇事实上偏重于宏大叙事，而赖建则偏重于细节考据，是这方面的又一本力作。

说到细节，赖先生的功夫，那叫一个到家。他先在楔子中交代问题意识，检讨相关文献，然后对边军的指挥系统，边镇历史和财政年度出入、边饷支出做了最详细的计算与介绍。最后得出结论：“边饷日虚，是明朝国防的长期结构性困扰，不容易因某人的某项对策就能挽回或者改变，这是逼迫明朝走向败亡的过程之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查。国家的发展说到底，还是要靠财政支撑，因此，如何扩展国家的财政能力，成为所有国家谋略的重中之重。在所有的选项中，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被认为是最有选择，只有在尊重每个人的产权，释放每个人的市场创造性的前提下，国家财政能力才能形成稳定的财源。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可惜中国人似乎死不买账，原因在于，一旦尊重每个人的财产自由权利，国家的权威、既得利益的小圈子利益就会受到制衡。这正是一代代皇朝粉墨登场，又黯然退场的经济学理由。

再谈谈赖建诚老师的另外一本书，《亚当·斯密与严复》（赖建成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 月）。这是一本只有 174 页的小册子，但是赖先生从 1989 年开始，经过了 15 年的摸索，停顿、重新出发和再修订。赖先生说，这本书的结构，是站在舒尔茨 1964 年发表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第五章的基础上，所做的专题深入性研究。舒尔茨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卓著，特别是《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对发展经济学有着重大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他于 1979 年与另一名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名大名鼎鼎的刘易斯，正是人口流动模型理论的集大成者。这两名经济学大家的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经济建设，指导意义重大，留待以后专门来说。

赖先生强调，他关注严复现象已经很久，想通过学理性的研究，找到西方思潮如何引入中国的内在逻辑，发现中国人对西方学说的种种回应，所以他认为，对严复的观察，是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重要题材，虽然在这方面已经有人着墨很多，但赖先生坚持认为，这方面还需要更加专业的深入分析。



说到严复，有一些小史料很有意思。他于1877年5月去伦敦求学，专业是海军，到1879年1月返回清国，不到两年时间，他涉猎的过程包括物理、化学、炮台图、海道图、海战史、铁甲船、炮弹学等等，学业压力很大，并没有时间接触到经济学。所以有人就猜测，严复可能是在英国的报纸、刊物和传闻中听到了亚当·斯密这个人和他的书，但没有深入阅读了解。所以，赖建诚先生认为，严复很有可能是回国后才比较深入接触西方名著，而原因在于，他回国后屡试不爽，无缘官场，心灰意冷之际，才把兴趣转到学术上。感谢糟糕的官场，中国人从此才有了严复这样有眼光的读书人。他还翻译过《群己权界论》，其实就是密尔（又译穆勒）的《论自由》。2007年戴新伟老师给我布置作业，把雷蒙·阿隆的《论自由》和密尔的书结合起来，写一篇关于自由的书评。我翻了差不多2个星期的书，写了一篇《我们如此不了解自由》，现在我自己还爱看。对自由的理解，就是那个时候才有了个眉目，感谢戴老师。

说了这么多，还没介绍赖建诚先生。他还很年轻，1952年生人，算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专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看他的介绍，有几本书我有兴趣，1992年他出版了《重商主义的窘境》，他翻译的《入戏的观众》，也是雷蒙阿隆的作品，还翻译了波伏娃的《波伏娃的告别，与萨特的对话》。很有意思，怎么感觉和我的知识兴趣有点相似，估计是个人文趣味很足的教授，但愿有机会能够面见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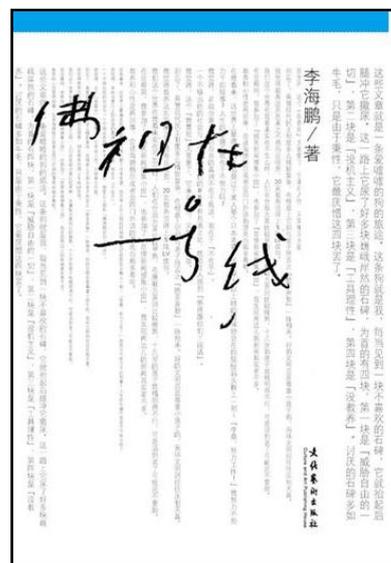
最后一点感叹，大陆似乎出不了赖建诚这样扎实的学者。好多人人都去骗课题经费，盘剥学生，或者走穴去了，还有几个志存高远的教授，满脑子学而优则仕，幕僚情结，上书情结。这是一种极为低俗的思维原型。知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知识人所有的工作，只与知识有关。一个社会如果始终无法形成独立的知识人阶层，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粗鄙的，功利的，短视的专制社会。由此，让我们一起羡慕一下赖建诚先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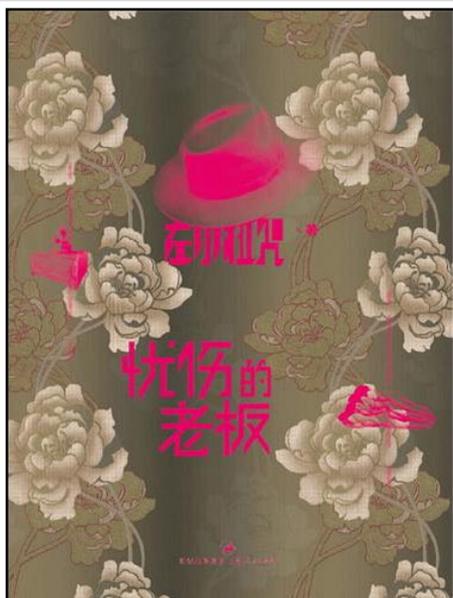
##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mailto:youjinma@gmail.com)）

我一直觉得有一种优雅而不仅仅是愤怒的写作，去评论那些社会新闻的同时又能给人以启发，重要的是你还要写的好玩，以至于可以让更多的人在没有什么障碍的情况下就喜欢上你的文字。在我们看惯了社论文体，以及那些操着社论文体但却一直看不上社论的人的文字后，偶尔能听说过比如E·B·怀特或者冯内古特这些人的名字（后者的《没有国家的人》，刘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是我读过最懂得幽默的随笔集），他们都是美国人，是给文学期刊写作的美国作家，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能这么写。即便王小波，我觉得他也不算美到可以率领一种文体的地步。算了，我也别兜圈子或者藏着了，得首先承认，我是李海鹏的忠实读者，从他当年给一本不靠谱的杂志《甲壳虫》每期写卷首语开始，我就开始见到属他名字的东西都会看。不过说到这部处女作《佛祖在一号线》（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6月）对于他来说，既算不上起点，也算不是什么里程碑，我知道，李海鹏的志向不仅于此，可能古今中外但凡对文字有点野心的人，都不会止步于随笔这种文体的——尽管他已经把这件事做到了至少汉字里的最美程度。这个随笔集，有着优雅飘逸的文风，不仅适合对文字有审美能力的人看，也适合关心近年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社会的人围观，因为大家知道李海鹏曾是《南方周末》记者，他的文章里不同程度地提到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我一定要再画蛇添足地加这么一句，李海鹏不乏见识又能把道理讲清楚，而这一切在他笔下又都是那么好玩，这非常重要。

中国的E·B·怀特？不，还是别这样肉麻，它也是不准确的，至少我在天涯上看过李海鹏的大中篇小说《做天才》，他应该跟文字的关系更为复杂，我们不着急地拭目以待。“中国的XXX”，这已经成为一种庸俗的范式，大多把欧美发达一点广为人知的东西直接拿过来、套上、呼之，再加上一番意淫，大概内心中真的会自以为升天了。比如中国的奥斯卡、中国的诺贝尔、中国的格莱美……哈哈，直到恶心得你笑不出来为止。说到中国的艺术，大概也算是与国际接轨了，至少在价码上蒸蒸日上，但说到影响力这玩意儿，我们还是应该多低下头看看现状。近二三年来，国内先锋音乐艺术家左小祖咒越来越被精





英消费者追捧，除了他敢于 500 一套 CD 地卖，还有荣登各类音乐奖项颁奖礼、媒体关注的先锋人物，还有这个人的确是中国目前少见的一个可以把你忽悠得很舒服的超级艺术家。我小人之心地猜测，左小祖咒一定知道达利，一定晓得安迪·沃霍尔，那他有没有在这两个名字之中选择一个跟自己形成某种关系呢？比如，前面说的“中国的安迪·沃霍尔”。哈，这又是一个玩笑，左小祖咒的粉丝众多，千万不要当真啊。他的这部自传《忧伤的老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有着跟他的一切艺术行为一样的迷人标志，不那么善意，时时聪明，并随时准备给你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格雷厄姆·格林是我喜欢的作家，算不上心水，但绝对算得上欣赏那种，他恰到好处的聪明，但不在他的读者面前卖弄——他懂得尊重一切认识字的人。《斯坦布尔列车》(黄梅、黄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7 月)被格林划为自己的“消遣小说”类(相对一种是“严肃小说”)，顾名思义，消遣即为讨好读者，但格林传达给他读者仍然是那种跟人类困惑有关的命题，这也非常重要。在一辆欧洲列车上，多情的犹太商人、失意的政治流亡者、善良的歌舞演员、机敏的拉拉和小报记者、做作的畅销书作家、凶残的惯偷……他们相遇了，

这是一个考验作者阅历的故事，他至少要把各个不同民族和背景的人物合情地装在一个故事里。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不怕被人笑话，读小说我是从贾平凹、苏童读起来的，现在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开端。但说起看电影，可就是“师出名门”了，丹尼·博伊尔的《猜火车》——事实证明，他后来的作品证明他是伟大的，至少都是我喜欢的范式。要说的是，《猜火车》(威尔士著，石一枫译，重庆出版社，2010 年 7 月)这本小说被出版商弄的很糟糕，翻译、包装都足以这部电影的拥趸失望。这部电影以及它的故事，大家一定都听说过，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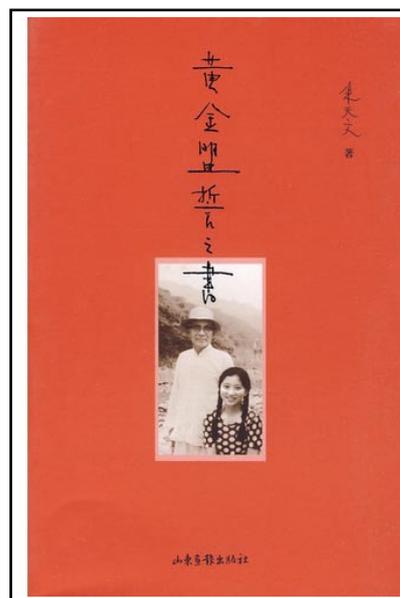
最近我为了挑战自己，想看看从来没关注过的“推理小说”，我专挑了名气大的东野圭吾的短篇小说集《黑笑小说》(李盈春译，南海出版社，2010 年 7 月)作为入门读物。非常遗憾，大概是我见识和理解力，我对这部标榜“奇书”的小说感觉非常平淡，最多就是小故事，没看到一点小说的美感。我猜测，这显然不是“推理天王”东野圭吾或者推理小说这种类型小说的代表作，我选错了入门读物。

《拍卖第四十九批》(托马斯·品钦著，叶华年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7 月)其实上世纪 80 年代就曾出版过，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显然没有品钦的《V.》、《万有引力之虹》之类的著名，尽管这是这位作家相对好读的一部作品。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黑色幽默”的粉丝，我爱冯内古特，也爱科恩兄弟，但也没有读过《拍卖第四十九批》。这算遗憾吗？我觉得不一定，读书有时也要有点缘分，谁能说我和《拍卖第四十九批》的缘分今天来得就算晚了呢。

##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gmail.com](mailto:zhm7976@gmail.com))

我有一位十分爱读书的女友，她几年前向我推荐朱天文的小说文集《炎夏之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 1 月)，可我并没有太在意。那时朱天文似乎只是一个传说，她的书在内地书店也并不多见，2009 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她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这位对于朱天文痴情不改的女友又给我发来短信，郑重推荐朱天文，可我已久不读小说了，便先选了朱天文的文集《黄金盟誓之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年 1 月)和《最好的时光》(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1 版)。这两册书都收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朱天文作品系列”中，而如今的朱天文似乎一夜之间成为大陆出版界的宠儿，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朱天文作品系列”也是一本接着一本。言归正传，我读这两册朱天文的作品文集，一下子着了迷，觉得她的文字有着一一种神奇



的魅力，两书的内容也着实有趣，前者为她的散文集，叙述的却是自己文学之路的前世今生，而后者则是她的电影作品集，其实更重要的便是叙述自己文学之路的转折，以及文学才华因为相遇的升华与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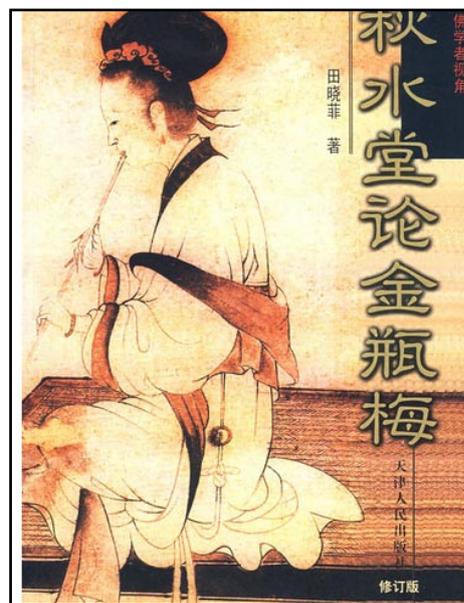
阿城在给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一书的序言中，称赞朱天文为文学界的“稀有金属”，我读这两册书后感觉这比喻实在有趣和精确。朱天文的文学之路，仿佛是一种被融化和升华的过程，她出生在一个文学世家，父亲朱西宁与母亲刘慕沙都是台湾现代文坛著名的作家，特别是父亲朱西宁，曾经与现代文坛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有所交往，并且是典型的资深张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难怪朱天文、朱天心以及朱天衣三姐妹都会成为台湾有名的作家，特别是朱天文与朱天心，几乎成为台湾当代文坛的一种不可替代的风景。也因此，朱天文在文学上的早慧让人惊叹，后来经过父亲朱西宁的努力，朱天文与朱天心拜师到台湾进行客座访学的胡兰成成为师，文学才华一跃而升，格局气象为之一新。《黄金盟誓之书》便是这样的一册事关自己文学命脉的著述，其中她对于胡兰成的追忆与论述最为动人，特别辑有“记胡兰成八书”系列，分别为“狱中之书”、“怆情之书”、“优昙波罗之书”、“黄金盟誓之书”、“神话解迷之书”、“弥撒之书”、“阿难之书”、“忘情之书”，并且此书的封面采用朱天文早年与胡兰成郊游时的一张黑白照片，那年迈流亡的胡兰成与青春秀气的朱天文在一起，似父女又有情侣之感，由此可见，胡兰成对其文学生命的重要。

朱天文早年因父亲的影响，从模仿学习张爱玲入手，但遇见胡兰成之后，似乎文学的黑洞被整个照亮，由此呈现出喷薄的文学气势，这种文学的相遇影响了朱天文，这册《黄金盟誓之书》可以说就是她在多年后献给胡兰成的一个隆重的精神与纪念的礼物。而《最好的时光》则不然，它是朱天文文学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记录，因为在1982年与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的相遇，使她成为侯孝贤最为重要的编剧。他们一起合作的作品便有十分知名的电影作品《小毕的故事》、《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最好的时光》等，这些电影作品频频在国际以及台湾的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同时也为朱天文赢得了盛名与荣誉。但与其他电影剧本所不同的是，朱天文的电影剧本也是独立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我还发现，尽管朱天文对于张爱玲的告别是那样的坚决，但在这些剧本中却流露出太多张氏作品的痕迹，许多地方甚至有神似之感，而张爱玲当年也是电影文学创作最早和最有代表的作家之一。在我看来，侯孝贤同样是朱天文在文学上的一位解人。似乎朱天文每一次的文学变化与成熟，都有一位特别关键的人物出现，他们仿佛是一种文学的催化剂，让这块绝世稀有的金属变成真金与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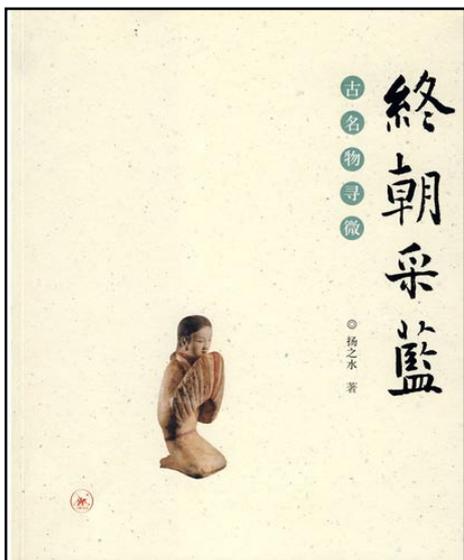
但不管怎么说，朱天文都是不折不扣的才女，只是她的作品一时出版的过于集中，都有些让人眼花缭乱，占据了我不少书架的空间，看上去十分的优雅与壮观呢，可惜我只能先满足自己的趣味了。而同样是才女，田晓菲的传奇一点也不逊色，却走的是另一条崎岖坎坷的学术小径，但却难掩她的才气与学识。

且说这田晓菲，十岁前便通读了古典名著《红楼梦》，写诗写文颇有名气，十八岁便得了北京大学的学士学位，二十七岁又拿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又与鼎鼎大名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结成伴侣。我读田晓菲，先是她的一册《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2版），此书我曾与原著对读而过，十分过瘾。田晓菲在这书中论及《金瓶梅》，以为其胜过《红楼梦》，而她更喜爱明代崇祯版本的绣像本，前一论点我并非完全赞同，但她在此书中细细谈论全书的魅力与神采，竟也自成一家。田晓菲此书以散文札记的方式写成，但能够统揽全书，而不是各成一块，又试图打通中西文论，却不拘泥枯涩，而是融化会通，显示出她十分良好的学术底蕴；而我更喜爱她在文字中流露出自己对于人物与事迹的个人情绪，统统都是那么有烟火气息，窥探出作者内心世界的性情与哀愁出来。起先，我是不赞同读名著又读那些解读文字的，如今看来，却是十分偏颇的。

此书之后，我先后读过田晓菲的著作便有如下几册，《赭城》（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1版）、《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8月1版）、《留白：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1版）、《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1月1版），尽管这些著述基本上都是田晓菲所写下的学术著作，甚至是大部头的古代学术论著，但我却读的津津有味，常常能从她繁琐与严谨的论证之中，看到一种清丽与优美的气息，这种久违的感受让人陶醉，而我也忽然发现在田晓菲众多的著述之中，似乎在形成一种十分特别的研究格局，这便是一本书，一座城，一个人以及一个时代。所谓一本书，便是她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对于中国明代文学经典小说作品《金瓶梅》的研究和解读；一座城，便是她对于留存于西班牙的古阿拉伯文明遗迹赭城（Alhambra）的研究与游历；一个人，显



然是在《尘几录》中对于中国古诗人陶渊明以及其作品的版本流传的探究；而一个时代，也就是在今年由北京的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烽火与流星》中，她对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少为人关注的短命王朝萧梁时代的重新发现与解读，这些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发与愉悦。这样学术著作，真是读一本就是少一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田晓菲的两部学术著作《尘几录》和《烽火与流星》都是最先由英文写就，其中前者由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在 2005 年出版，后者则由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社于 2007 年出版，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册著作却都是由田晓菲独立署名，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册书一定是经过了作者的重新书写，由此确保了其论著的严谨以及无可替代的才华。



似乎一不小心，这次的读书报告成为了一次对于才华进行盛赞的歌颂文章，但即使如此，我也十分情愿自己几乎每次都能成为那样令人难以释怀的优秀著作的鼓吹者，也既然如此，我还要盛赞最近我闲翻过的另外一册著述《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三联书店，2008年11月1版）的作者扬之水。关于扬之水，谷林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论述：“我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当时是在司机班驾驶卡车的司机。她比我年轻三四十岁。她如今改行了，在社会科学院研究先秦文学，考究古代名物。”而张中行老先生在《负喧三话》中的记述则更为传奇与幽默：“她的经历，除去嫁个规规矩矩的高干子弟，生个孩子之外，任《读书》编辑之前，我最清楚的是，大革命时期，也是她的少女时期，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食品店操刀卖西瓜。”很难想象，这位起身草莽的知识青年，做过卡车司机，也操刀买过西瓜，但仅仅因为热爱读书，先是成为盛名时代的《读书》杂志的编辑，后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她的几册著述诸如《诗经名物新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先秦诗文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古诗文名物新证》（紫锦城出版社，

2004年）等等，也绝非寻常人物所能写就的。

近来工作之余闲翻这册《终朝采蓝》，越读越有味道，原本以为是十分枯燥的古代名物的研究论述，但读来却是十分的舒服，其文采、趣味、学识、品位以及视野都是当下一流的境界，后来我偶然看到先生关于自己读书往事的回忆文章，才有所了解，在那篇文章中她推荐三十年来对于自己影响至大的著作，别人都是二三十种，再她则仅有三种，其一便是钱钟书的《管锥篇》，其二便是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其三便是中国文学的传奇之作《金瓶梅》。扬之水说，《管锥篇》让她懂得做学问的境界，《知堂书话》教给他做文章的秘诀，而《金瓶梅》里的世界，则最终使她走上了中国古代名物研究的道路。有了这三本书作为铺垫，难怪她的著述如此令人着迷。在那篇文章中，扬之水写到自己在做学问之初，被王世襄介绍给历史博物馆的老学者孙机，老先生交给她的任务就是不断的写读书报告，那时她见书就读，后来火候差不多时，老先生交给她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楚辞》的名物研究，一个是关于《诗经》的名物研究，扬之水选择了后者，最终写就了她的成名之作《诗经名物新证》。由此她感慨，因为孙先生不是高校里的研究生导师，因此不能给她博士学位，但她却一点也不遗憾。如今，扬之水的名物研究已经别有洞天，她以广泛的读书、考辨、研究和查证等手段，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格局，时下她的又一册著述《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4月1版）也已经出版了，我是决定接下来慢慢享受的。

##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mailto:veron.cq@gmail.com)）

《盗梦空间》（Inception）继《阿凡达》之后又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观影狂潮，我也未能免俗，无法抵挡豆瓣网上如潮的推荐，跑到影院过了一把大片瘾。我并无胆量像许多“知名导演和影评人”那样，去为它的电影史地位作一番评头论足，但是毫无疑问，这部影片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让我十分兴奋，那就是：什么是真实（reality）？

电影里的“真实”与梦境之间，当然存在确定无疑的“真假之别”，就算深入了三层梦境，抵达潜意识的尽头，仍然存在一个“真实”等待做梦者回归，电影卖尽玄机来吸引观众的噱头，无非也就是“真实”与“梦境”之间相互混淆、真假难辨，



所以才需要特别的“图腾”(如陀螺)来作鉴定“是否醒来”的工具。从这点来看,这部电影的立意还是相当“笛卡尔式”的,也就是说,导演无意否定我们所看、所听、所识的这个“物质世界”,而是将意识与物质分为两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深入并且操控潜意识,建构出另外一个“世界”,甚至可以一梦就是五十年,但是那仍然是“梦境”而已。

虽然从这个角度看,“意识里的梦境”就算再逼真,但难免和我们周遭的物质世界形成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和佛教所言的“心能转境”趣味毕竟不是一条路上了。至于影片中的这类“意识控制”的技术,虽然如今科学界已经尝试利用各种仪器,如核磁共振扫描仪来读解人的潜意识,但毕竟还未成功扫描出具体的意识信息,更谈不上控制意识、甚至建构潜意识世界了。但是除开现代自然科学,人对意识的了解和控制就别无他法?

谈到意识,大家自然首先会联想到哲学,毕竟哲学主要关注的就是人的意识问题,举个例子来说,近来开始为国内学界所熟悉的沃格林,就曾专门写过“意识理论”的论文,探讨意识的本源问题,对于他而言,意识绝非如笛卡尔那般物质与精神二元分立,而是彼此交错互动,通俗一点讲,人是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而不是“机械组合”。更为有趣的是,为了探讨超越意识的产生机理,沃格林曾经做过一系列有趣的科学实验,试图通过“回忆童年记忆”,来探讨他个人的超越体验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样的实验无论如何,看上去都十分粗糙,甚至也让人难以理解,《回忆》(*Anamnesi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一书的英文版译者 Gerhart Niemeyer 就认为这部分无甚价值,甚至试图删除这些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沃格林的思辨努力虽然达到极致,但是面对捉摸难定的意识,仍然显示出其“认识工具”方面的缺陷与不足。

由此之故,沃格林将自己视为是“神秘主义哲学家”,他承认人类意识里难以穷尽与把握的丰富性,并且认为人可以部分认识和体验这些意识,但是他并不相信,人类有能力或者有方法来充分把握意识的复杂性,所以他认为人始终处在一种处在神与动物之间的“中间状态”。

这里谈到神秘主义,西方哲学与宗教学界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根据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种种》(尚新建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的说法,宗教神秘主义体验大抵有四个特征:对不可能的表现;直观的洞察;瞬间性;被动性。这种神秘主义的体验由于在现代哲学的视野里,一般被视为是非理性的、无法实证的,从而加以排斥,但是在西方比较宗教领域,神秘主义仍然是非常关键的研究对象。

不过我们或许会问,“神秘主义”是否是不可知论?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几大重要宗教对于神秘主义体验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修行技术,这种技术使得“神秘主义”本身是可认识、可把握的(当然这种把握能到什么程度,那就因人而异了)。



修行不仅会给修行者一些特别体验，而且还能产生一些特异功能（佛教里称为神通）。例如最近关于李一道长的特异功能问题，坊间也是争论不休，认为一提特异功能就是装神弄鬼，关于李一本人是否拥有特异功能，自然要有待公证机构作出具有公信力的判断，不过关于特异功能（或者佛教里的神通），我们或许也需多了解相关的背景才能做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例如最近读到一本描写南传佛教女阿罗汉 Dipa Ma 的传记《佛陀的女儿》（艾美·史密特著，周和君译，台湾橡树林文化出版，2003年），里面就提到这位南传佛教的修行者，曾在上个世纪修得神通，但是她只在其老师穆宁拉的面前演示过五种神通，分别是神力通、天耳通、天眼通、宿命通和他心通，而她之所以修习神通，也只不过是因其导师——缅甸著名的马哈希尔尊者的建议，但是这位导师本人，却只是一位“慧解脱者”，也就是说他不具神通，但是却已经证得了阿罗汉的解脱果位，也可见佛教不重神通重解脱的基本原则。而在此，想给对佛教有初步兴趣的朋友郑重推荐圣严法师的《学佛三书（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佛学入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佛法自然涉及到神秘体验，因此对心灵的要求不比常人标准，如果缺乏正信，难免流入邪门外道，成为兜售“特异功能”的邪徒，但国人往往又以各种“特异功能”作为衡量修道人的标准，则难免为骗子所利用。

关于修行技术，由于缺乏系统的宗教团体传授，汉地宗教的修行技术要么流于“秘传”，要么就是“盲修瞎练”，尽管汉传佛教经典里记录了相当大量的修行技术，例如《瑜伽师地论·声闻地》里关于修行止观，其实有大量具体详实的内容，但是由于缺乏强大的僧团传承，这些修行法门实际上隐而不彰，世俗之人也将此类修行当作神话或文学修辞看待而已。例如对于道教而言，罗浩（Harold D. Roth）所著的《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严明等译，学苑出版社，2009年1月）一书，就认为《管子》的“内业篇”记载的是道家的修行技术，比如“四正”——“正形”、“正四体四肢”、“正气”、“正心”，就已经和天台宗的《童蒙止观》里所讲的“调身”和“调心”十分相似了。而近年来在国内流行的南传佛教，更是以观音尊者的《清净道论》作为修行的不二指南，笔者读到此书，才真正了解到过往耳闻的种种神秘修行体验，其实并不那么神秘，都有具体的技术指引，当然，修行的技术只是一个基础，要学有所成，尚需更多的东西。

当然，这些内容对于那些对宗教修行技术比较陌生的读者而言，难免显得费解，事实上，国内日益流行的各种内观禅修营，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开始自身亲证如何认识自身心灵，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对心灵有探究的兴趣与勇气，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无法离开具体的修行技术，否则只能沦为空谈。

谈了这么些老书、旧书，自然是因为如今新书佳品太少，难以推荐，不过最近刚买到一本沃尔夫·勒佩尼斯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却十分有趣，作者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会疑惑的问题，为何德国如此璀璨的文化无法阻止纳粹，德国的文化巨子们，为什么往往还会支持纳粹暴行？

这些年，我阅读了不少关于第三帝国的许多音乐史著作，强烈地感觉到，无论福特文格勒等人当时有多少反纳粹的行为，这批德国音乐家其实最为关心的仍然是文化以及文化给德国人所带来的那种“文明优越感”，正如埃里亚斯所说的：“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务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与骄傲。”

正是这种“反政治”或“去政治化”的态度，导致了他们在精神上蔑视政治，在现实中企图利用或者逃避政治，最终却会被“政治”拖入暴行的深渊。尽管德国的老文化贵族们曾经企图延缓和阻止“第三帝国”对文化特权的削弱，但是希特勒却巧妙的“收买”了这批老贵族，也让许多文化领域的后进者（如理查·斯特劳斯）不惜出卖犹太人而获得自己的特权地位。

这段德国的历史悲剧无疑曾经一度让德国文化人蒙羞，也让德国文化蒙灰，如今当巴赫、贝多芬、布鲁克纳、理查·斯特劳斯的音乐仍然响彻于世界各大主流音乐厅时，我们对于德国文化的“魔力”是否已经多了一点免疫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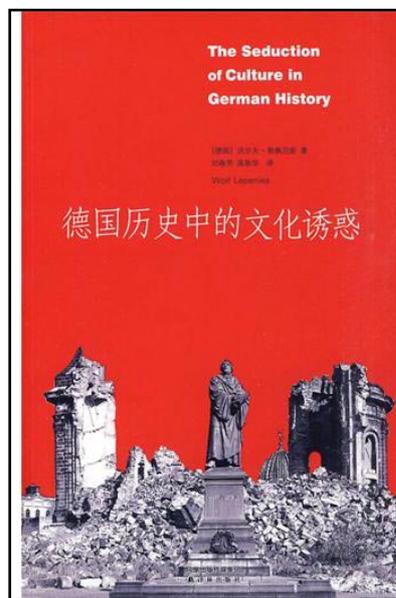


图1为《盗梦空间》剧照

## HISTORY&CULTURE 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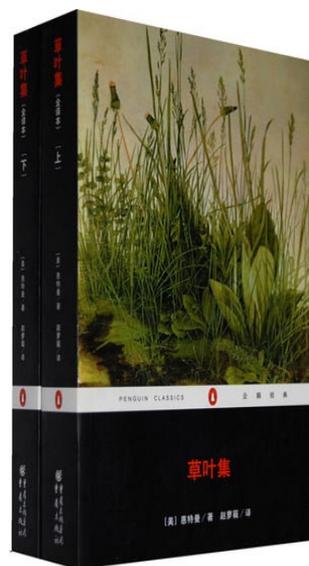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8月底,在云南住了几天。到了昆明,直奔现在的云南师大、当年的国立西南联大,准备发思古之幽情。到了这个曾经被称为“民主堡垒”的地方,发现西南联大的历史几乎被简化成“一二·一”运动史。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隐身于一个角落,不足为外人道也。极尽哀荣的西南联大杰出校友,除了“一二·一”运动中遇难的两位学生,就是一些核弹、航空专家,文科教授中只有闻一多、李公朴两位先生被反复提及。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校门口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名录的石碑,那些熟悉的名字不偏不倚。

当然,没有必要将西南联大神话,也没有必要神话民国。钟苑苑(“中研院”?)先生在《究竟是谁的西南联大?》(《南都周刊》2010年8月23日)里,批评《联大八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编辑粗陋”,缺乏必要的背景介绍,同时指出这本书“以偏概全”,“记录了西南联大左翼学生的八年,但没有记录普通学生以及右翼学生的八年”,文章最后批评了把“怀旧”当神话的倾向。这种批评性的书评,现在很少看到,我总觉得多多益善。被批评者不必生气,一本书有人认真读过并且写下读后的感受,是件幸福的事情。如果有不同意见,接着撰文反驳,你来我往,其乐融融。

离开云南师大,取道云南大学去翠湖,偶遇会泽院,这是20世纪20年代东陆大学的校址,在唐继尧先生的主持下建立。会泽院和咫尺之遥的熊庆来、李广田故居,在傍晚的阳光下迎风而立。虽然刚刚说过不必神话民国,但是民国的风物常常别有一番气象,或许不是民国太“神话”,而是今日太“魔幻”。

到了一座城市,免不了要寻访书店。用手机上网搜索了一下,立即看到麦田书店,再查看一下地址,就在附近,于是摸索过去。书店很小,似乎比大学的寝室还要小,密密摆放着书架,人在里面勉强转身。寻访书店,我的主要目的不是买书,而是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但是到了这些独立书店,我又总是要买些书,尽管明知道这些书在上海不难找到,不必千里迢迢地运回,但是不如此,无法表达我对独立书店的精神认同。挑了几种,其中有赵萝蕤先生翻译的《草叶集》(重庆出版社,2007年),这个译本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曾经出版,属于著名的“网格本”,现在很难找到,幸好重庆出版社再版。



谈到书店,在豆瓣上看到一则消息,位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夏书店,被校方勒令撤出校园。据说是因为销售台版史景迁的著作,又据说书店并未公开销售,有同志主动询问,店家拿出,被钓鱼。都是“据说”,迄今没有看到公开报道,但是书店即将关闭,得到网友证实。在网上看到华东师大师生致信校长,情真意切,希望能让书店继续生存。大学之大,难道容不下一家书店?这种消息总是让人黯然神伤。



谢朝平先生以《火花》增刊的方式自费出版《大迁徙》,增刊没有及时报批,这是瑕疵,但陕西渭南警方以人口普查为名,跨省抓捕,这就不是瑕疵,而是巨大的错误了。同样,如果书店销售台版史景迁,是程序上的瑕疵,因此让书店关门,就是错上加错。

文化部部长蔡武先生,抵达台北访问,一出机场就直奔胡适故居,此外还参观了钱穆故居,他对两位先生充满敬意,并且表示钱穆全集将由九州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是“传统文化的一件盛事”。据悉,钱穆全集将一字不改。对胡适和钱穆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两位先生的文章中敏感词出现的频率,远甚于史景迁。既然胡适全集和钱穆全集都可以在大陆出版,对于台版史景迁的著作,又何必那么草木皆兵呢?

周保松先生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三联书店,2010年6月),有一篇跋《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他回忆在香港中大读书期间,曾经策划几次论坛,一次是邀请香港三大政党党魁和一位名嘴,讨论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近千同学参加,从黄昏到天黑,挑灯夜辩。大学里有各种读书小组可以参加,他还参与学生报纸,报纸

不仅发表对大学校园的看法，还关注香港、珠三角乃至全球的问题。作者笔下的大学生活，对于今日大陆的大学生来说，恍如隔世。

周保松还著有《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在大陆出版。承蒙作者赠送，得以先睹为快。《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是一本学术著作，读者以政治哲学的爱好者为主，《相遇》是一本随笔集，适合每一位具有反思意识的大学生。书中收录了他和老师的对话，和学生的通信，还有一些随笔。看到这些，同样作为大学教师的我，自愧弗如。抛开体制性的因素，作者给同学写信交流，常常数千字，虽然我跟同学的交流不算少，但是常常以聊天为主，很少付诸笔墨。周保松指出，香港中大最重要的传统，是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我想，这也应是所有大学的精神。不过，实践了这种精神的大学屈指可数。所以，我们才会那么缅怀西南联大。

## ART 艺术

观察员 言一 (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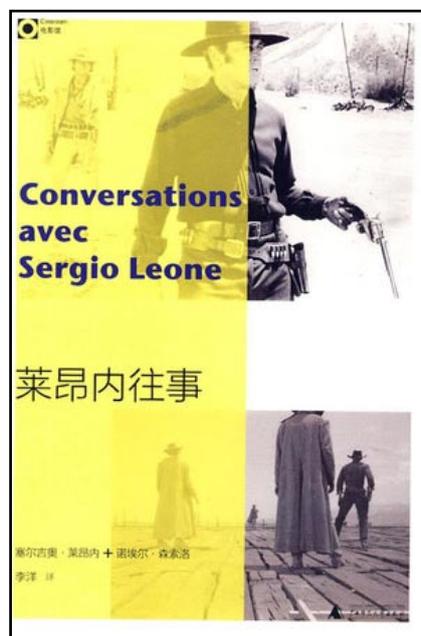
有时观影太多太过凌乱，会让人不知如何下笔，不管是打算写写笔记抑或报告。面对着过于汹涌的资源，如何看，如何听都成为了问题。我困扰不已。

上半年的电影书籍呈现出某种井喷，不少出版社都在书封内页列出了自己的电影书系，然而高企的价格和难以保证的翻译质量令我望而却步。唯一信得过是李洋所译的《莱昂内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而吉林出版集团所出的几本则有糟践原著之嫌。莱昂内的作品，我看得不多，也无法把它们放入西部片的脉络里来写。但就我在8月所看的两部往事而言，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拍摄于1968年的《西部往事》，被认为是莱昂内对自己所拍西部片的总结陈词。这个结点，既是莱昂内本人的转型，亦是片中狂野西部终结的开始。片中，熟悉的决斗场面，不再是莱昂内镜头下的重点；相反，人物的遭遇与种种细节的铺垫，将时代大背景烘托的无比清晰。片尾在汽笛声中前行的火车，显然不同于侯孝贤镜头下的火车——侯孝贤镜头下的火车，常常反向而驶，驶向乡愁——它驶向的，是工业文明的来临，是资本的胜利。铁路与火车，作为工业文明的象征，实在值得细心关注。如果没有铁路，美国如今的西部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伦敦当年的万国博览会，乃至当下的上海世博同样也会变得不可想象。每一条铁路的架设，都会对所经地域带来波及诸多层面的复杂影响。人力，资源的便利流通或许是有利而颇具说服力的一面，但因此造成的城市积聚，对地景的破坏，以及速度所带来的时空压缩却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说在《西部往事》中莱昂内尚且只是以暗示的方式来传递自身思考的话，在《革命往事》中，对于革命的反思却是再明显不过。影片一开始就打出了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用暴力去推翻另一个阶级。暴力成为革命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或是面对革命中，暴力所造成的伤害？于是，我们听到胡安极为不忿地抱怨到：读书的人到不读书的人那里去，说“我们必须改变”，于是穷人们就去改变。然后那些读书的人就坐在大桌子边，谈着，谈着，吃着，吃着，吃着。但是那些穷人们呢？他们死了！之后又怎样呢？妈的一切又重头再来。

不论是对于73年的莱昂内，还是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似乎都已经离生活远去。但胡安那段极为犀利与讽刺的吐槽所带出的问题却远未得以解答。工业与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中，没有了革命，却依然存在抗争与社会运动。作为个人的主体，尤其是相对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知晓了革命的暴力伤害之后，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方式来参与抗争或是社会运动；同时，他们又是否拥有不参与的自由，能保障他们安然置身事外？《Russian Lessons》的导演 Andrei Nekrasov 就曾坦诚说到：我并不希望在我的国家爆发暴力革命，但如果没有革命，普金永远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审判。对于暴力革命，莱昂内与 Andrei Nekrasov 的态度都可称得上含混和暧昧。而这样一种态度背后，却是对应着清醒与冷静，对应着反思的能力。



相比之下，单一与狂热的态度才最为值得警惕。

有趣的是，新近的一部英国电影《四头狮子》以一种十分戏虐的方式切入了眼下极为火热的反恐话题。影片中的诸多搞笑情节完全走向了与《24小时》相对的另一个面向，让人不由自主地预设影片会以闹剧收场。然而，真正的结局却是无限悲凉与反讽。就像犯罪学家曾如此提问：究竟谁是罪犯？(Who is the criminal?)，《四头狮子》亦在质疑：恐怖分子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我们则可以进一步问到：革命与反革命份子是如何被制造(produced)而出的？

文学与电影之间从来千丝万缕。去年为纪念太宰治诞辰100周年而拍摄的《人间失格》，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竟是一票难求。同样改编自他作品的还有《斜阳》与《维荣的妻子》(又名《樱桃与蒲公英》)。只是，我在8月禁不住去追随的，却是另一位小说家藤泽周平。藤泽周平的一系列小说，如《黄昏清兵卫》，《蝉时雨》，《隐剑秋风抄》等等早在2年前就由台湾木马文化引进出版。同是李长声先生的译本，《黄昏清兵卫》却是直到最近才登陆国内。比起太宰治作品所改编拍摄的电影之良莠不齐，藤泽周平的作品目前几乎由导演山田洋次一手操办，三部曲的每一部都可称得上是上佳之作。

小说与电影中的武士往往在一开始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以传统的价值观和武士道精神应对着周遭的世事。尽管时有妥协，倒也从容。然而，总有风波突起，社会悄然变迁。传统价值与武士道精神是否还足以应对风波与变迁成为了武士真正的考验。藤泽笔下的武士全都选择了固守，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历史的车轮所伤害。可是，他们在这种固守中所展现出的温文与隐忍，却是令无数人动心动容——不论哪个时代，都必然会遭遇世事的两难，人际当中的纠葛，乃至劫难。从而，每个人都不免怦心而问：换作自己，又当如何？



在山田洋次的作品里，朴素与隐忍似乎是他不变的主题。从寅次郎的故事到如今的清兵卫，再到最新的姐姐(吉永小百合，《弟弟》)概莫能外。也因此，在山田的新片中，人气女优苍井优的光芒完全被年过60的吉永小百合压过一头。这并非是因为她演绎欠佳，而是其本身气质太过青春与现代，演不出那份传统的质朴与温婉。可作为对比的是，在《东京》中与香川照之的一场对手戏里，饰演机器人的她可谓如

鱼得水，尽展迷人魅力。

尽管在前些日子里，曾和刘柠老师说起：如今的日影再拍不出当年(80年代，以及更早)的气质，自己也越来越多的沉迷于那些年代久远的影片当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日影新作，我始终是有所期待的，毕竟像《入殓师》，《步履不停》，《周围的事》这样的影片，或多或少会唤起一种对于传统，对于家庭的回望，审视，乃至重估。换句话说，比起“惊世骇俗”的《盗梦空间》，我更加期待的，是枝裕和的新作。《盗梦空间》的巨额票房，在我眼中，既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也不意味着诺兰的剧本是多么地神鬼莫测；相反，我所看到的，是国内大众精神食粮的极度匮乏与文化积淀的贫瘠。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着一个没落的电影工业。

最后，我希望可以在此表达自己对于导演今敏逝世的哀悼之情。从《彼女の回忆》到《未麻の部屋》，到《千年女优》，《东京教父》，到《妄想代理人》，《红辣椒》乃至最新的1分钟短片《早安》与未完成的《造梦机器》，今敏的才华横溢毋庸置疑。于我而言，他仿佛就是电影界的保罗·奥斯特，在某一独特议题——梦境/妄想与现实——的分析和展现技巧上做到了

无比地专注与纯熟。可是，为了完美地呈现梦境/妄想与现实的交织，在剧本和制作方面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今敏的作品风格也因而显得华丽，缺乏一种沉思的气质。因此，在日本的几位动画导演中，我喜欢押井守要多过今敏。然而，当我细细读过他亲笔写下的 5000 字遗书后，我如同被闪电击中，一种敬重内心油然而生。原来，他对于生活竟是看得这样通透，动画制作不过是结合他个人爱好来报答亲友的最佳方式，而他真正眷恋的，是这世界上无数细微的美好。想来，也只有这样的他，才能这般清明地直面生死吧；而对于他的突然离去，我只能微笑着说再会。

图 2 为山田洋次导演、吉永小百合主演电影《弟弟》剧照

## 阅读报告 · 台港海外

### GERMANY 德国

## 德国种族主义在抬头？

特约撰稿人 扬克（德国，asukashinjirei@gmail.com）

法国的移民骚乱众所周知，相比之下，德国人与外来移民似乎一直相安无事，但近日出版的一本《德国在自取灭亡》却让德国的移民问题浮出水面，乃至引起轩然大波。此书作者是德国联邦银行董事、前柏林市财政部长萨拉青（Thilo Sarrazin），他在书中声称：“因为移民和低收入群体的生育率远高于精英阶层，德国人的平均智商水平将不断下降，整个德国社会将越来越愚蠢。”

萨拉青是一位杰出的金融专家，但一年前就以针对穆斯林族裔的挑衅性言论闻名。在去年 10 月德国高端杂志《Lettre International》刊出的专访中，他扬言：“依靠国家生活却拒绝这个国家，不合理地安排孩子的教育，只是不断造出一些小头巾女，这样的国民，我绝不承认”，“土耳其人将像科索沃人占领科索沃那样占领德国——通过高出生率”。这些言论招致的强烈批评与谴责却丝毫没有让这位 65 岁的退休政客止步，反而出版了一本厚达 400 多页的书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论证。确实，萨拉青在书中的论述显得有理有据，甚至非常科学。他提出这样几点论据：一、德国的人口出生率在不断下降；二、出生率与社会阶层具有相关性，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会更想要更多小孩；三、根据生物学研究，智商 50%到 80%可遗传；四、根据抽样调查，智商与社会阶层显示出相关性，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智商整体偏低。根据这些论据即可得出这样的逻辑推论：整个人口结构中低智商人群将会越来越多。

如果萨拉青的观点仅止于此，最多就是一个歧视劳动阶层的反动人物，但他的矛头很快对准了土耳其移民。进一步的论述同样建立在科学研究和事实之上，而且用他的话说，“干脆、简洁、清楚、准确”。他引用德国教育学家 Elsbeth Stern 的观点：“对于学生的高要求将导致更大的不平等而非平等，因为机会越平等，基因就会发挥更大的效用”，而在德国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土耳其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德国学生以及其他族裔。萨拉青认为，土耳其学生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导致他们比印度人、中国人和南意大利人做得差，那么症结就在他们自己身上。所以，尽管他并没有明说土耳其移民智商偏低，但显然想诱导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此他还举出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实：“在近东移民中基因的枷锁——源于那里普遍存在的近亲通婚——造成很大影响，这也导致他们患上各类基因疾病的几率高于平均水平。”萨拉青显然想为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糟糕表现找到一个生物学上的解释，他甚至做出这样的证明：土耳其青少年普遍有暴力行为是因为他们在性上受了挫



折，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婚前性行为。如果把萨拉青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论据分开来看，大部分都成立，但当他用貌似科学、合乎逻辑的三段论将所有这些联结在一起时，就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低劣的土耳其人将通过三四倍于德国人的生育率最终占领德国，德国国将不国。

这位金融专家拼凑他人研究结论写出的“生物社会学”之作本来完全不值一读，但他的话题实在击中了德国人敏感的神经。早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公布的一些节选就引来如潮评论，《时代周报》为此在8月26号就对他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专访，30号正式出版后很快登上畅销榜，5天之后就加印至第六版，关于萨拉青的新闻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各大电视台也就此举行现场辩论。

之所以掀起这么大的风浪，确实因为土耳其人在德国已然成为一个问题。德国移民人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总人口9%上下的水平，土耳其籍占700多万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一，另外截止2008年取得德国国籍的土耳其人约有70万。与法国相似，拥有伊斯兰教信仰的土耳其人与德国社会的融合程度最低。萨拉青书中列举的许多现象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土耳其人并非不被德国社会接纳，而是不愿意也没能力融入德国社会，他们形成相对封闭的聚居区，遵守伊斯兰教戒律，不愿意学习德语，不交德国朋友，不重视子女教育，任其频繁旷课，更反对女子受教育，女孩十四五岁便被迫结婚，结婚后至少生育三个孩子。另一方面，与其他族裔移民不同的是，根据欧盟与土耳其的相关协议，从2000年起在德国拥有居留权的土耳其人所生小孩能够自动获得德国国籍。于是，近十年来不断增多的土耳其人和他们成堆的子女以及与德国基督教社会巨大的文化隔阂引起德国人越来越多不满。所以，尽管萨拉青的言论立刻遭到各大主流媒体口诛笔伐，德国总理和总统相继表示谴责，萨拉青所属的社民党也启动调查程序，拟将其开除出党，联邦银行董事会甚至也破天荒地要撤销其董事职位，但他在民众中却获得广泛支持，数家媒体的民意调查均显示大部分人至少部分认同其观点，《画报》这份在六十年代学运时间间接导致学运领袖杜切克被暗杀的民粹报纸所作问卷更显示，90%多的人认为萨拉青是一个说出了别人不敢说出的真理的英雄。

如此情境难免让人怀疑德国种族主义在抬头，要知道，当年的反犹运动并不只是纳粹的鼓动，而是有着广泛民意基础。虽然土耳其移民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回顾一下几个世纪前欧洲犹太人的处境，就能发现他们也受过类似指责。信守犹太教的犹太人也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精英阶层的犹太人讲希伯来语，底层犹太人还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语言意第绪语，这都导致他们的被排斥与受迫害。当时的犹太思想家认为只有通过世俗化才能摆脱灾难，但放弃犹太教信仰的欧洲犹太人最终也难逃一劫，而与今日所谓低智商的土耳其人相比，他们的高智商与社会成就照样成为纳粹德国攻击的借口。如今，在土耳其人取代犹太人成为德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后，在德国人经过战后深刻的罪责反省后，人们却不得不遗憾地发现对外来族裔的猜疑与排斥在德国仍有着深厚土壤。对移民融合虽然有好的制度保障，但德国人在心态上对移民的接纳并不高，60%多的土耳其移民也觉得自己不被德国人承认。不过，德国毕竟已经是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有理智的知识阶层，有自由开放的媒体，公众能够通过充分讨论澄清事实、理清问题，萨拉青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也能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被消化。比如说土耳其人好吃懒做，享受国家巨额福利，对德国没有任何贡献，在各种统计数据面前立刻证明站不住脚，土耳其人受教育程度低则不能归结为任何生物学原因，而有文化上的原因，这并非不可改变，土耳其人的生育率在二三代移民中也呈下降趋势，为此，德国人也大可不必担心。

图为反对萨拉青(Thilo Sarrazin)言论的公众表示抗议

## JAPAN 日本

### “零增长”、“小日本主义”与“下流社会”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mailto:postdadaist@gmail.com))

近年来，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名字在日本媒体上悄然升温：下村治；尘封多年的著作开始再版，其理论被重置于传媒、学界和政策研究的视野下。

下村治(Osamu Shimomura)，已故经济学者，六十年代初期池田勇人内阁打出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幕后操盘者，作为构筑高度增长理论并使之体系化的“总设计师”，曾经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经济学家。但如此乐观高调的“高增长论”的“教父”，却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际提出了“零增长论”，令世人大跌眼镜。下村的结论很简单：石油价格既然已膨

胀四倍，那么“浸泡在石油中的日本经济”将不得不进入“零增长”。从“所得倍增”到“零增长”，主流经济学家缘何走极端？尚在高增长的惯性中乐不知返的上班族甚至质疑学者的学术人格。事实上，即使增长势头已成强弩之末，但日本经济的增长毕竟维持到经济泡沫崩溃前的1989年。历史仿佛雄辩地反证了“零增长论”的不靠谱，对其始作俑者的负面评价至今都未完全消除，下村治其人也随着昭和时代的终结而作古（1989年1月，改元“平成”；同年6月，下村去世），但对其“零增长”学说则至死不悔。

下村果真错了吗？未必。其实，无论高增长，还是零增长，无非都是基于“下村版”增长理论的逻辑结论而已。早在石油危机之前，下村便主张高增长已然结束，日本经济发展将逐渐减速。因为他看到，高度增长是当时日本的劳动人口、对先进国家的赶超效应和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等要素有机组合、因缘际会的产物，而前提既丧失，减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下村来说，“零增长”既是对成熟的日本经济的诊断，同时也是下一阶段发展的目标。以“零增长”为发展目标，容易被误解为“以不发展为发展”，乍听上去颇刺激，甚至令人怀疑经济学者的学术动机。但下村的“零增长”理论的核心在于，以石油危机为契机，实现根本性的产业调整，把此前积累的社会财富用于繁荣文化学术，提高生活品质，从而“使日本回到江户时代的样态”。对日本近现代史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会明白，下村绝非主张开历史倒车，而是因为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江户时代确乎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中兴的和谐社会、魅力社会。

实际上，石油危机以降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公共事业和出口产业的拉动。公共事业在刺激景气的同时，也是造成国家巨额财政赤字的祸根。出口依赖型经济，则产生经常性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的加剧、升级。而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激化的风险，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过分强调扩大内需，结果便引发了八十年代末期的经济泡沫。下村在其最后的遗著《日本不坏——坏的是美国》一书中，警告日本经济对美国政策过度应对将导致悲剧性后果，今天回头看来，诚不啻对后来“泡沫经济”的空谷足音般的先知预言。

预言家大抵是悲剧人物。战前，在对外扩张政策恶性膨胀，不惜以策动侵略战争确保所谓“国益”的“大日本主义”甚嚣尘上，军部、政府、学界、媒体举国若狂的时候，新闻记者出身的著名政治家、前首相石桥湛三（Tanzan Ishibashi）针锋相对，“不合时宜”地提出了立足于国际协调路线和自由贸易体制的“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海外殖民地和军备，以人为本，兴业通商，以“小”博大。用今天的学术话语表达的话，就是放弃基于“富国强兵”论基础之上的、与列强拼硬实力的传统战略思维，立足于人的尊严与福祉，振兴文化软实力。在某种意义上，战后六十余年来，日本所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未尝不是对“小日本主义”战略韬晦的伟大社会实践，尽管这种践行未必是自觉自愿的自我选择，相当程度上是“被选择”的结果。但甭管怎么说，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发达，客观上便证明这种发展理论（或曰战略思想）是富于生命力的，值得研究、评价。

过去二十年，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遭遇了被称为“失落的二十年”的长期萧条，并因此而酿成了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化景象，做下了战后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问题。而几乎与此同时，从2005年开始，日本人口已过增长拐点，开始持续减少，老龄少子化社会已然定型，势必迅速发展。一个劳动力呈慢性不足、财政赤字两倍于GDP的发达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何以在人口红利已成“过去时”的时代，不复凭借生产力，而是靠文化、艺术、科技、体育来维系自身的发展，告别“下流社会”，作为福利国家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评价，从石桥湛三的“小日本主义”到下村治的“零增长论”，也许并未过时。而邻国日本的问题解决及其解决的程度，对包括正处于老龄社会门槛上的、史上前所未有的“未富先老”型社会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无疑具有超越本国的摹本的意义。

图为日本电影《亲爱的医生》剧照。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安静而衰老的时期，老龄化影响着日本的经济、产业模式和社会关系，《亲爱的医生》是对此的写照。



## BOOKREVIEW 书评

### 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二）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mailto:sunchuanzhao@yahoo.com.cn)）

具有奴性的人，如果遇到冷酷无情的统治者，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偶然失误的结果。当今这个奴性在大学教授中弥漫的时代，最终必然是这样的结果。这个时代也是阿尔霍多夫那样掌握人事权的官僚可以像王侯那样为所欲为的时代。时下奴性的普及是很明显的，现代德国士官的那样军人服从本性蔓延、与精神相比更加重视物质的社会风气、学术市场劳动力大于需求的过剩供给等要素，都是加速奴性普及的原因。

——桑巴特《阿尔霍多夫》（1907年8月）

我在《非常时期的大学行政化(之一)》中谈到，百年前美国教授们争取建立了终身教授制度来缓解自己对失去“饭碗”之恐惧。同一时期，对德国的大学人的“饭碗”具有致命威胁的国家行政权力正在发威，真是一个高等教育体制非常转折时期。与美国的相比，百年前德国的大学行政化问题和当今中国行政化现状更加近似一点。日本学者潮木守一的《建立德国现代科学的官僚——影子教育部长阿尔霍多夫》（《ドイツ近代科学を支えた官僚：影の文部大臣アルトホーフ》，中公新书，1993年）很多方面涉及德国大学史上这个问题。鄙人下面又要借花献佛，围绕潮木守一的著述谈谈大学行政化问题。



中世纪德国分裂成很多小邦国。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签订之后，这些邦国都成了拥有主权绝对主义国家。这些小邦国的统治形态的两大原则是：“多边权力统治”和“理性主义”。国家管理权力逐渐向教会渗透，政教合一，教会成为邦国教会，原先教会管辖的大学蜕变成邦国大学（Landesuniversität）——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进入18世纪，古典人文课程逐渐减少，作为管理官僚必须的读写、计算等实用技能“教养”课程日益增加。邦国大学之所以还保留一部分传统的哲学、人文课程，是为了把这些课程作为学习神学和法学之中介，以此传统来强化官僚统治阶层对被支配阶层的卡理斯马威望。19世纪初，洪堡等德国理想主义者提出以“陶冶个人人格、修养”为目标的大学理念，目的是为了对抗这股潮流，企图以哲学为传统人文主义核心课程，把大学从来自外部的国家权力控制中解放出来。但是，洪堡等人构思教育改革设想的时候，也正处于普鲁士国家强化对大学控制的年代。1787年普鲁士建立了高等学务委员会，由行政官员、大学教授和拉丁语学校校长组成。这表示教育的行政权完全从教会移交给国家机构。19世纪以后国家权力与洪堡等德国理想主义者在观念和制度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大学成了考核、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力机构与大学作为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矛盾上。对于来自国家行政的权力，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抵抗是无力的，可谓形势比人强。而且，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后，哲学院的地位得到强化的同时，开始由大学主持实施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内容。这一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建立，使得哲学为核心的人文学科也落入职业训练教育体系的网罗里去了。虽然哲学院的发展推动了德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的发展，但是，洪堡等人的大学教育改革的理想和措置，不仅没有阻止大学摆脱陷于职业教育的趋势，而且也无法抵抗运用国家行政把持的职业资格考试（饭碗！）来强化对大学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控制的各种决策。至19世纪末，普鲁

士的资格考试基本上都已经纳入学校教育体制之内。斯普朗格在1912年所做的题为“过去100年间大学本质的变化”演讲中,谈到国家对大学压力越来越大时,曾说过一句话:“包罗一切的国家考试体系很清楚地说明了国家对大学的期望”。所谓“包罗一切的国家考试体系”,就是第二帝国期间,教育部把发放“饭碗”的权力都从民间行业协会的手里收夺来,转移到国家机构的分支——大学行政体系内。

比如,本来司法资格考试、医生资格考试成了国家委托大学主持的资格考试,从医生协会、司法协会等行业团体转移到大学的医学院、法学院。首先把决定知识人“饭碗”的考试、颁发资格证书的权力收归到国家行政机构——教育部手里。从爱德华·希尔斯编的《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所收的文章可以看到同一时代20世纪初韦伯对德国大学的日益严重行政化趋势担忧及其表达的愤慨。与美国相比,没有实用主义传统的德国大学抱有更严重的问题、可以说遭遇了致命的危机。至17世纪末为止,各邦国政府虽然任命大学监督官,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官职,其实是顾而不问。普鲁士等大学教师人事采用、晋升制度基本还是由大学内部教授会自己决定。这一制度表面上也存在编制外讲师与作为国家公务员教授之间的学术竞争,似乎也有某一大学教授与另一大学教授之间竞争,因为除了国家的薪金外,大学教授的收入的一部分也来源于学生选课的听讲费——课时费,从争取学生听讲、挣得更多课时费出发,从不希望有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来自己所在大学任教,所以一种与外校教授同行之间的竞争实际是不存在的。各大学出现人事空缺、教授位子空缺的时候,都是从校内进行选拔、补充的。决定权在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手里。这种人事制度也就是所谓“教授自治”体制的一个最重要部分。这种行会式的教授自治在人事问题上有封闭起来小团体帮派化的弊端,所以,18世纪初,洪堡设想让中央政府来管理大学教职的人事,刺激大学教授之间、大学之间的公正竞争。他在《大学的内在与外部结构》一文中说:“大学教师的任命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中,众所周知,除了设立公正的国家管理大学机构之外,由学院的教授会来任命教授决不是一种好的制度。”1817年普鲁士设立了教育部,就是兑现了洪堡设想。以后半个多世纪里,德国大学大致还是依照惯例,先由大学教授会提出推荐人选,大部分在教育部审查后认定。从设立教育部开始,中世纪以来大学教授会手里的人事管理权完全落到教育部官僚手里。然而,与学术自由关系最为密切的正是大学人事制度(也包括财政制度,因为人事编制涉及的工资、研究经费与财政拨款有密切关系)。以后,普鲁士等邦国教育部的常规是让大学教授会先提出三个候选人名单,最后教育部从中选拔一个,教授会保留了推荐权。总之,从行政法规上来说,作为国家公务员编制之内的大学教师最后决定任命权力,已经归教育部。这样大学已经不是中世纪初创时的那种学者自治的团体,成为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教授成为拿国家薪俸的官员、公务员。国家、教育部行政机关与教授自治团体之间的人事等权限上的矛盾与冲突,到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一直是德国大学一个不能解决的难题。当年洪堡等人原先的设想、主张由国家教育部把握这大学人事权力的目的,是把国家看作一个中立、公正的机构,来调整大学教授会内部的派阀偏见、平庸和腐败。

然而19世纪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高涨,是德国大学人事制度发展成极端的“阿尔特霍夫体制”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外部条件。即自从1882年至1907年弗尔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担任普鲁士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人事处长期间,大学教授任命和升迁,完全由阿尔特霍夫个人说了算,他几乎无视大学教授会的推荐权。以至大部分教师、教授为了任职或升迁不得不低三下四匍匐在他的脚下(教授为了研究经费等事宜到教育部见他一次,几乎都得在走廊里等大半天)。《建立德国现代科学的官僚》,74页)我们从《韦伯论大学》所收的文章,可以读到:马克思·韦伯在媒体上一方面批判阿尔特霍夫代表国家控制了教育的人事权力、垄断了学术评判的权力,剥夺了学者的学术自由,把德国的大学教授都塑造成对权力臣服的奴性;同时也承认阿尔特霍夫的本身的人格和能力,说他实际是个人才,是个视野及其宽广的人。事实上,阿尔特霍夫也曾确实提拔了一些险些被埋没的人才,其中有好几位以后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同上,26页)他有自己广泛的信息渠道、自信心和判断力。得到大学教授会推荐名单后,不完全轻信该大学教授会的推荐,因为推荐本身也可能存在各种偏见或舞弊,所以他的做法是:1,派部下或亲自去大学教育第一线听课、调查;2,亲自认真阅读、调查各种学术刊物,从各种学术批评刊物及其文章来进行分析、做出自己评价,虽然被推荐者往往给他邮寄来大量的研究成果不能亲自一一过目;3,听取其他大学同一领域著名教授们的意见。这些做法使得他能成功地选拔一流人才。阿尔特霍夫对推动德国大学及其科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他任职期间,是德国大学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所谓洪堡着手大学改革的19世纪以后德国大学所达到的一个巅峰时期。是他从财政部争取到巨额的科学研究经费;也是他在各大学建立了大型先进的科学研究所。那么,为什么德国学术界的韦伯、桑巴特、梅尼克等一流学者却都认为“阿尔特霍夫体制”是一个腐败的体制呢?这个操纵凡庸的大学教授命运的体制、强化教授们奴性的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呢?桑巴特分析说:其一,这样的体制建立在教授也和常人一样,有对名利带来的物质享受追求的本能的弱点之上的,特别是在突然迅猛走向现代社会的时代;其二,经过近百年大学扩招的德国,研究人才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更具体地说来,要取得教授职位,除了必须要有博士学位,还至少要有四至六年的研究成果积累,才

能提交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通过审查后才具备申请教授职位的资格。按照德国大学一个研究领域一个正教授职位的讲座制,要获得填补这样空缺职位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追究和总结纳粹成功上台各种要因的时候,许多学者的反省中,就把当时大学教授们对阿尔特霍夫“独裁”体制的臣服,看作以后大学教授屈服于纳粹体制的前奏,例如,有的德国学者就说:“那时候我们没有学会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去言说、去行动,阿尔特霍夫死了后,依然这样,还是沉浸在对上司的恐惧之中,所以当纳粹上台时,他们都会一一失去节气。”还有人说:“他无视教授会的推荐权,实施专制的人事制度,犹如是他对大学施与恩惠,培养教师们臣服教育部的奴性。他就是利用学者间的竞争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弱点。为何德国的大学都对纳粹体制毫无抵抗,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原因。”(同上,100-101页)桑巴特看到的是教师们所谓“人性的弱点”——怕丢饭碗和得陇望蜀的无止境的、强烈的名利欲;韦伯看到了“人治”行政体制的要害。尽管洪堡等提倡“不为面包的学问”,但是实际上德国大学教师们也不会不为名利所动。德国大学一个学科只设立一个正教授的讲座制,各个大学间的正教授工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别,名气越响,可以通过应其他大学招聘跳槽的手段,改善自己的收入、待遇和研究条件。如果正教授不能得到国家的充分的研究预算经费的支持,也很难在学术上与其他得到国家经费支持的同行竞争。(同上,61-62页)与当今中国大学的情形很相似:正教授兼有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位的话,无论在经费支配、掌握的人事权力(可以拥有更多的助手。所谓助手,包括编制内的副教授、编制外的副教授、编制外讲师以及正在争取获得教授资格、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乃至自己的薪俸收入,都远远超过不担任这行政官僚职务的正教授。因为操纵了经费和资源,在研究条件上,如前所述,实验室的设立和运用等条件优越,也更具有竞争力。当时的研究者把所长看作“国王”。(同上,70页)于是,就形成一个奇突的行政化体制,所长掌握生产资料(资源来自国家、国民的税金),手下的“助手”成为雇员,同时也像德国当时爆发的劳资纠纷一样,研究所的雇员与他们的“国王”雇主发生冲突,尽管没有发展到激化程度。比如,1907年发生过普鲁士全国大学理科助手要求教育部增加工资的运动;1911年普鲁士副教授联合会要求教育部限制研究所、所长对他们无限制使用的权限。(同上,70页)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作为助手在订雇用合同时,都得守诺合同规定的在该研究所取得成果,最终都得归于该研究所,也就是所成果带来的名利都得归于作为正教授的研究所所长。能掌握研究所经费人事大权,得到高额薪俸等利益的正教授当然是少数,是那些与阿尔特霍夫亲近的教授们,阿尔特霍夫在关于各个领域的正教授任命时,也必然听取这些人的意见。(潮木守一,《德国的大学》,讲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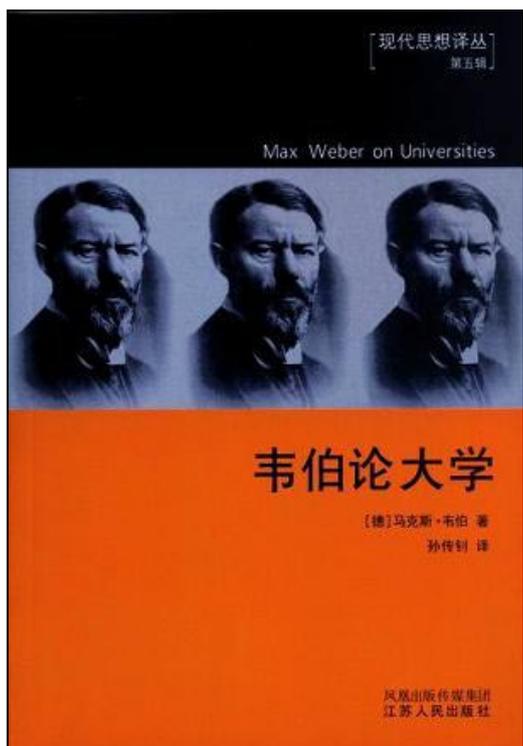
1992, 268 页) 因为无论是学生还是编制外讲师大多是年轻人, 都热切想取得博士学位或教授资格。而掌握审批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权力都是在正教授手里。于是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听讲正教授的课程, 所以在课时费收入上, 编制外讲师的收入也不是正教授的这项收入的竞争对手, 到手的报酬非常可怜。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 晋升为正教授变得越来越困难。自然科学领域, 1860 年至 1884 年期间, 平均时 37 岁晋升为正教授; 1910 年至 1919 年期间, 要 41 岁才能得到晋升; 1920 至 1922 年平均为 43 岁。到了 20 世纪, 要有更长的年限呆在编制外讲师的位子上。1860 年平均 8 名编制外讲师竞争一个正教授职位, 1920 年时 20 名编制外讲师竞争一个正教授位子。(《建立德国现代科学的官僚》, 68-69 页)

阿尔特霍夫掌权的时代, 韦伯注意的是当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官僚体制中的“强人管理”的弊端。韦伯对为普鲁士现代教育做出贡献的“强人”阿尔特霍夫个人品格与管理能力没有恶感, 却强烈批判普鲁士教育部对大学教授任命的人事干预, 原因就在于: 这种国家行政权力操纵下的人事制度, 单凭官员个人的品质也很难保持它的廉洁。韦伯当时最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大学的人事制度的变化, 即工业大生产也开始瓦解德国大学里的传统的人事制度习俗和洪堡的理念。大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最先出现了大型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所, 不仅只有得到国家行政机构教育部的拨款才有可能创建和维持, 而且, 因为规模大, 原先讲座制的人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大学教师的主力军——取得了大学教师资格后不拿国家薪金的编外讲师制度开始瓦解, 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里的助理教授的职位——从属于教授(所长)、也领取国家薪俸。另一方面德国大学的文科的研究班(seminar)授课制度也因为需要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制在 19 世纪后半很快在整个德国普及起来。国家通过大学教师职位、薪金的经费预算牢牢地控制了大学教师的人事制度。为这个人事制度, 韦伯挺身抵抗、捍卫将要被国家行政当局或垄断资本全部攫去的“大学人”的“学术自由”。例如, 贝恩哈德事件是普鲁士教育部第一次出现不经过柏林大学教授评议会认可, 自行任命贝恩哈德(Ludwig Bernhaed)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 背后有隐含着这样事实: 当普鲁士政府见到不顺眼的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的时候, 就会任命一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为教授。通过这样的任命来消除前者的影响力, 而且含有对前者惩罚的意思。所以, 韦伯等人把后者取得的职位叫做“惩罚教授”。国家一开始掌握这一人事权, 就把政治信仰列入审查的标准之内。1894 年发生的阿隆斯(Leo Arons)事件是一个典型事例, 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连编制外讲师(extraordinarius)的资格最后也被剥夺。这事件也是大学完全丧失学术独立人事权的一个分界线。1898 年 6 月关于国家高等教育机关的编制外讲师雇用的行政处分的相关法律在议会通过, 从此法制上对编制外讲师处分的最终权力归于教育部长。

1899 年, 33 岁的副教授克尔特·布莱奇希在他编辑的《普鲁士年报》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 就遭到阿尔特霍夫的惩罚, 被阿尔特霍夫叫到教育部谈话。阿尔特霍夫警告布莱奇希, 你 31 岁这么年轻就被提拔为副教授, 不知恩图报, 却批判政府。为此, 布莱奇希付出 26 年的代价——到 57 岁时才晋升为正教授。(同上, 78-84 页) 到 20 世纪初, 政府根据财界——德国中央产业界联盟的意向来任命教授又成了普遍的现象, 所以, 出现政府限制信仰社会主义的学者担任大学讲座之教授职位的措施。韦伯的好友罗伯特·米歇尔斯就是因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被排除在德国大学门外。还有, 我们还可看到, 格奥尔格·齐美尔这样的哲学家因为是犹太人, 宗教信仰和民族也成了那种人事任命制度的牺牲品。国家在行政上对大学控制的强化、资格考试使得大学进一步沦为职业训练的场所, 编制外讲师制度的动摇, 同时影响教师和大学生的生活根基和学术生涯的追求, 使得当年洪堡把学生也作为具有创造力的一员, 把学生和教师一样看作是科学研究的“学徒”的理想彻底毁灭了。只有极少少数学生甘心把人生来赌一把, 铤而走险。瓦尔特·本雅明就是一个典型。

教授群体本身品质也为这种行政化所腐蚀。19 世纪末柏林大学因为它在普鲁士的特殊地位, 柏林大学教授中也很明显出现利用权力的接近和转移来谋取名利的腐化倾向。韦伯痛心地说: “在柏林大学, 像其他地方一样, 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强烈人格的学者, 继承、保持其学术团结与独立于高层教育行政当局的光荣传统。但是, 人所共知, 这一个群体的人数并非在逐渐增加。不幸的是, 对柏林的教授们来说, 距教育部的大门是如此之近, 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令人不快的形势一直有不断恶化的趋向, 普鲁士的‘地方大学教授’向那些实际上或据说是影响力的柏林同事写信诉求和抱怨, 希望后者能够在‘高层决策者’中为他们说情。个人与教育部关系的这种围绕权力运作——实际上已经在每个领域或多或少地以公开的形式在发展——毫无疑问, 这也经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柏林的学者们运用于他们的学术发展。但是, 我们必须指出, 即使大权掌握在一个不懈地追求学术绩效的评估客观性的人的手里, 当一个人控制这么多赞助权力的时候, 仍旧有被他个人偏爱与兴趣好恶所左右的危险。”(参见《韦伯论大学》) 1902 年也有学者曾这么评价阿尔特霍夫体制的利弊: “从教授会的立场来看, 他们的推荐被否定, 当然感到是一种对于他们的见识和良知的侮辱。但是, 其反面也是对教授会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一种批判, 教授会推荐并不是经常都从候选人的研究才能出发, 往往是从人间关系来考虑, 与家族关系、所属学派等等各种私利被纠缠在一起。总之, 大多不是出于实力这个要素来推荐, 而是搞一些阴谋小动作。结果长时间历史形成的惯例, 教授的评选方式, 在我们中被作为一种合适的方式, 让不合适的人占据了合适的岗位, 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德

国的大学》，270 页）以后还有学者更明确把教授会决定人事的传统说成导致德国大学衰退的原因：“如果亲自用自己眼睛看看教授会里面是如何决定选考的，就不会再对它有所敬意，没有再比这个谁也不负责任，缺乏良知的组织了。通常教授提名的都是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就算是征求专家的意见了，若是谁也不拿出自己意见的时候，一个教授的意见就成了全体教授的意见了。不够水平的人就会得到满口的称赞，是为了排斥本来就不准备提名教授心里的真正合适的人选。19 世纪初德国大学被称为俸禄大学（Pfrundeuniversitat）和家族大学（Familienuniversitat）。前者中世纪以教会组织内根据地为发放的俸禄。因为有固定收入来源，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位，于是，教会内部教育职务也逐渐形成，世袭接替的变相家族制度。因为这样传统，所以在教师选考的时候，往往重视的不是能力和实绩，而是考虑亲缘、人情关系。这不仅在 18 世纪德国存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也有同样腐败现象。（《德国的大学》，270 页，另参见《韦伯论大学》）



百年前的德国的大学，同样也受到大工业与现代商业的“金钱利益”取向影响，维系个人自由的人文主义传统也正在迅速消失。一方面，大学及其自然科研机构随着产业发展的需要规模也迅速扩大，导致雇用人事体系变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泛滥的普鲁士国家行政强化其对大学及其研究机构人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产业经济高度发展，商业利润至上主义业已渐渐抬头，商业人才需求的增加，使得完全是实用学科（商学）和实用学科的大学（商学院）进入了大学体系。1904 年马克思·韦伯考察美国的大学时，也已经看到传统行会式的学术管理制度和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行政体系下的德国大学，在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体制中已经失去活力，美国的商业管理主导下的大学将有无限的生机。所以，韦伯既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学术圈内手工业行会性的教授自治不满；看到了美国大学的体制中的商业自由竞争使得大学教学与科研更具有活力，又对德国政府强化对大学人事权的控制表示深深的忧虑。韦伯对由教授会决定人事还是由国家机关决定教授人选的两种制度都有异议，相比之下，还是更加警惕来自国家的干预，因为两者不是同一等量级的权力渊源。关于人事制度，美国大学是依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来决定雇佣人选，决定权力既不是出于国家、政府行政机关，也不是由教授会这样职业团体来决定。

到底何种学术人事制度、学术评价制度为好？对大学行政管理的限度应该如何设置？我想，制度固然第一重要，但是无论哪种制度、法规，关键是这种规则要建立在绝大多数人共同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行政管理决策者官员和研究者、大学人自我约束的道德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大学人、研究者的道德水准问题更为重要，因为万一来自行政方面的错误的、强制的干预，倘如学者们还能保持群体一致的道德规则和水准的话，会一起坚决、有力地抵抗这种无理、强制、错误的干预。最近似乎个别坚持制度决定论的中国著名学者的信仰，也因考虑到改革者品质这一人的要素发生了动摇，如郑也夫在博客中也谈到对今后是否还有能从事改革、建立有效制度的人才、群体表示忧虑。

本文谈到的百年前德国大学行政化产生的许多这个现象似乎与中国今天行政化很相像，但是当时德国大学世界一流，为何？——这是笔者希望读者独立思考的最重要问题。（未完，待续）

图 1 为潮木守一  
图 2 为洪堡大学

## BOOKREVIEW 书评

### 你在下面，不在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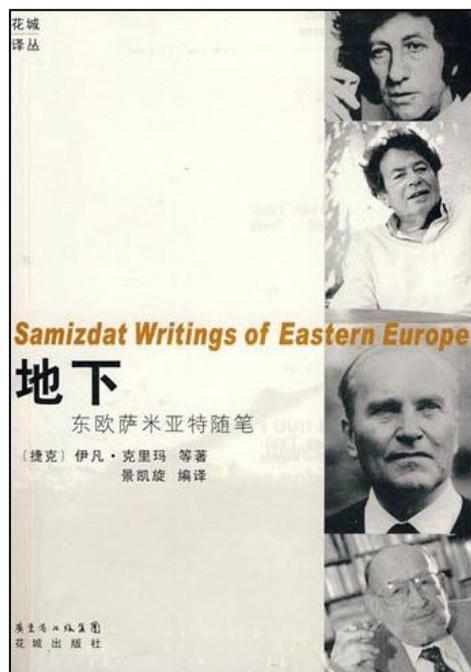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 iamlingyue@163.com)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中的萨米亚特(samizdat)一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东欧各国不断发生反抗体制的事件，诸如东德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等，这些反抗最终都遭到武力镇压。依附于苏联的新统治层上台后，往往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异见作家、学者被送进监狱或失去公职，作品则遭到禁止，不能获得出版和发表的机会，因为统治者知道“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仅在捷克——据1980年米兰·昆德拉在和菲利普·罗斯的一次谈话中透露——就有两百名作家遭禁，甚至包括死去的卡夫卡，一百四十五位历史学家失去工作。如此，历史被任意重写，真相则被谎言掩埋。

而东欧知识分子则通过萨米亚特表达着自己未经审查的独立声音。1990年同样在和菲利普·罗斯的谈话中，捷克作家克里玛介绍了捷克地下出版是如何慢慢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捷克那些被禁止写作的作家通常每月会到克里玛家聚会一次，包括大名鼎鼎的哈维尔、格鲁沙、瓦楚利克等，在聚会上他们大声朗诵新作，很快警察注意到他们，并要求克里玛取消这样的聚会。作为对抗，克里玛和朋友们商量，要把书稿打印出来销售以便赚回稿费。每版印刷的作品从十册到二十册不等，每册花费是一本正常书籍的三倍。“我们的所为很快传扬开来”，人们开始寻找这些书，随后新“作坊”涌现出来，而其他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警察起先也试图阻止地下出版，挨户搜查，没收个人收藏，但地下出版最终难以抑制。据克里玛估计，大约有两百多种期刊以及几千部书以地下出版的方式面世，质量虽有些参差不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它们最终在谎言编织的日常生活中撕开一道裂缝，使人们得以窥见真相的本来面目，或者哪怕仅仅是更接近真相的本来面目。它们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一个直接后果就是1989年秋天席卷整个东欧的革命事件。当然，地下出版不仅仅局限于捷克，在波兰、匈牙利、前南斯拉夫，地下出版同样活跃，人们对真理和真相的渴求，是地下出版之所以燎原之势扩散开来的最根本原因。这本中译本《地下》则是东欧各国当年有代表性的“地下”作家的随笔选，很遗憾里面没有哈维尔的文章，可是入选的十二位作家也都是东欧地下文学里的翘楚，他们的思考都有着往深处持续挖掘的特征，并带有明显的自我批判色彩。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在格言体的《给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同反对派站在一起：你在下面，不在反面。”虽然是给青年作家的忠告，但是把它作为对整个东欧知识分子群体的描述，似乎也是准确的。综观整本《地下》，尽管十二位入选的作者职业、身份、国籍各异，写作切入点有的偏重文学，有的偏重政论，但是他们对简单思辨都怀有高度警惕。他们显然都不愿让自己沦为当局声嘶力竭声音的回声，他们显然都知道事物的反面其实就是其正面的另一个形态，他们都善于朝着道德和良知的土壤往下钻探，那里多半是绝望的黑暗，但是也许正如哈维尔多次提到的那样——你必须先沉到井底，才可能看见星星。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哈维尔对此阐述得更清晰一些：“在这个世界上，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真实的人们及真实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在这个世界的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在我们去谈论、观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而集结在萨米亚特名下的东欧知识分子群，他们极力想去探寻的正是“这个世界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抱持为此可以受难的决心。

另一方面，身处“反面”虽然更刺激更易获得表面的名声，但单一的形象和意旨也是它必须付出的代价，更为危险的是这个“反面”随时会被“正面”同化，吸收它的恶并成为恶的另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而“下面”则意味着更广阔的存在，植物的根系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性在黑暗的土壤里自由伸展，它们因而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形象和更柔韧的价值观，并且因为这种“间接”抗争，他们得以从根基上摧毁专制政权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不是仅仅去换掉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然后再重蹈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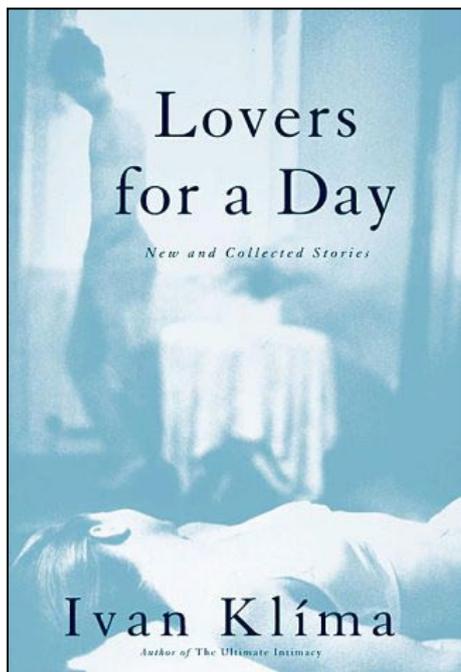
辙。

这个东欧地下知识分子群体以小说家和诗人为主，考虑到上述那些特征，这种组合绝非偶然，因为作家恰恰善于运用感性的观察，主要通过描述去传达更富人性的抨击之声，而且关注的范围也比一般的政治学范畴广阔得多。“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担忧兴衰更替的统治体系；文学可以超越这些，而且仍然可以回答统治体系在人们心中所激发出来的问题。”（克里玛语）这个声音没有“反面”的声音那么尖锐刺耳，却是从地平线慢慢升起来的，缓慢、凝重，覆盖着天与地。并不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观察犀利与否和他们文学上的成就成正比，优雅的文风几乎总是犀利观点的孪生姊妹。在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正是文学声誉最高的两位作者：伊凡·克里玛和丹尼洛·契斯。

克里玛的《不同寻常的童年》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身为犹太人，其童年正经历着最骇人听闻的迫害犹太人的时代，并且在泰里茨集中营待了三年半之久，有人“随时都可能进来敲打或者杀害他和周围的每一个人”。这篇文章是整本书里最打动我的，全篇都是冷冰冰的语调，处理那样的题材你不可能再用别的语气，可是某种抑郁、愤懑的激情又充溢在字里行间。克里玛叙述了自己作为犹太人如何一步步沦落到悲惨的境地：“一个接一个禁令。首先，我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接着我不能上学读书，不能去戏院，不能去电影院，不能去公园，也不能乘坐有轨电车的前面车厢。”直至1941年11月底，克里玛和父母被送进泰里茨集中营。相比愁苦的成年人，孩子的天性使他们容易忘却死神其实近在眼前，克里玛和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结下孩子们特有的纯洁友谊，可是“所有那些友谊的结局都很悲惨；我的朋友们，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进了毒气室，除了一个孩子，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叫阿瑞尔，他父亲是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在十二岁被枪杀了”。

整篇文章有着一流作家才具备的生动、细腻的描述，以及相匹配的深邃思考。其中有关集中营里偷窃的描述在其他类似的回忆中很难见到：有一次克里玛和一个朋友溜进了储藏室，里面存有党卫军从囚犯那里偷来的行李，“我拿走了一个装得满满的手提箱”。更重要的是对这种偷窃行为的分析：“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居于法律之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深受到影响。”在这里，克里玛笔锋一转，直指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他身处的另一个社会，这个极权社会因为建立在不诚实的基础上，因而使整个社会注定道德腐烂，并最终彻底崩溃。克里玛在指出这种社会必然下场的同时，其实也把矛头对准了自己，或者换言之对准了这个社会内部的每个人，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腐败暴力的同谋者，从这个意义上这种社会的每个人都难辞其咎。

克里玛这种严厉的自我反省态度在东欧知识分子群落中颇具代表性，几乎已成共识，整本书没有一个作者在对极权社会的激烈批评中悄悄洗脱自己的责任，相反他们总是首先意识到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自己也是整个社会之罪中的一个原子，以此为起点展开思辨。关于这一点，哈维尔纪念捷克“七七宪章”运动发起人、哲学家帕托切克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从纯理论思辨角度作了最为精深的阐释。文章从最寻常的一个日常生活场景开始：“一个水果蔬菜商店的经理在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中间，安放了这样的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疾风骤雨似的诘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什么东西是他试图和这个世界联系的？他真的热心于联合世界的劳动者这个意思吗？他热情如此之高，乃至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要让公众了解他的这个思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正是在这否定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伪善和谎言是如何点点滴滴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最终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道



德。哈维尔实际想说的是：通过展示他们的标语，每个人迫使其他人接受游戏规则，因而进一步确认了要求标语在首要位置的那种权力。每个人帮助其他人服从，在一种制度的控制下两者都是客体，但同时，他们又是它的主体。他们都是制度和它的工具的牺牲品。这一论述也仍然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极权社会里的每个人，因为正如捷克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国领袖马萨里克所言：“一个有尊严的民族，其命运惟一可能的起点在于人性本身。人性的首要任务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这同时也回答了另一个疑问——这些东欧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什么很少涉及具体的市场和法治层面，因为人性乃是社会的基石，人性之恶仍然会玷污任何市场和法律，除非从根本上清除人性里已经被极权制度玷污的杂质，之后的制度建设才不会脱离它美好的初衷。

书中选入的克里玛另外两篇文章也很精彩。《布拉格精神》是对布拉格这座城市由外到内的透彻观察，在这类以城市为主题的文章里显然属于最优秀之列。克里玛从布拉格的历史、建筑、方言入手，最终导出他的反极权主题：“布拉格的市民不是以刀剑，而是用玩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致命一击。然而，这种奇特的、不动感情的斗争方式深处却有着惊人的激情。”没错，我们从一批杰出的捷克作家的作品中早就看到了这种激情，这些作家包括哈谢克、恰佩克、赫拉巴尔、塞弗尔特，当然也包括克里玛以及他不太喜欢的昆德拉。想想捷克是一个多小的国家，它具有的如此丰厚的精神资源只有让人羡慕的份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基础，剧作家哈维尔才有可能在 1990 年当选为捷克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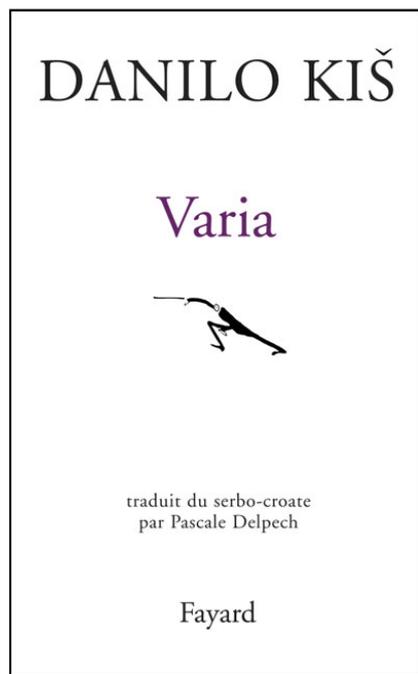
《地下》一书的开篇作家是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这大约是他的作品首次在内地出版物上出现，可对他我心仪已久。最早看到这个名字是在桑塔格文集《重点所在》中，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丹尼洛·契斯，写作时间大概是 1989 年契斯去世不久。在这篇纪念文章中，桑塔格以一种不容置辩的语气称契斯“是本世纪（二十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几位伟大的作家之一”，这种毫无保留的激赏立即引起我的兴趣——对桑塔格的眼光我向来深信不疑。后来托人在台湾买到契斯晚期两部重要短篇小说集《红木柄小刀》和《死亡百科全书》，这两部小说引起西方关注多少是因为鲜明的反极权意识形态，但这也不妨碍它们在美学上的造诣，正如布罗茨基指出的那样：“《红木柄小刀》做到了伦理道德无法成就的美学。”

这回在《地下》看到契斯的文章，的确颇为惊喜。在《中欧主题的变奏》一文中，契斯继续了自己一贯的反种族主义的立场，同时和克里玛一样，他也对那种简化的站队式意识形态立场表达了足够的警觉。在一次访谈中，契斯说得更清楚：“20 世纪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文学与政治的混合和纠结。很简单，我们作家曾被强制如此。甚至在写像《鲍里斯·达维多维奇的坟墓》这样的书时，我也在尽力改善这种坏状况：写关于政治主题的诗，而非政治的诗。”可能因为契斯晚年一直居住在巴黎，他对厘清意识形态对文学造成的副作用更敏感和热切一些，而克里玛由于在西方（1968 至 1970 年在密歇根大学教书）短暂逗留后重返捷克，意识形态对他来说更加迫在眉睫，所以他和契斯不同，虽然也申明文学之于意识形态的某种独立性，但是更多是对极权意识形态的抨击，并把这一点当然地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克里玛正是在这一点上抨击旅居巴黎的昆德拉的作品“和他的祖国失去了联系”）。相形之下，克里玛的文章由于带入大量自己的童年经验和极权社会下的生存经验，显得更丰富和性感，而契斯则更多展现自己思辨本身的复杂性，往往带有一针见血的锐利，这在格言体的《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下是我随意从文章中抽取出来的片段：“不要与任何人合作：作家是独立的。”“不要卑躬屈膝，君主会让你当他的看门人；不要骄傲自大，君主会让你当他的看门人。”“不要以民族的名义发言。”“不要让反抗社会不义的斗争使你偏离了自己的道路。”“谨防意识形态的滥调和引语。”——也许我现在做的，正是这句话所批评的，可是缠绕的复杂的逻辑正是使这些东欧知识分子免于被政治拖入庸俗境地的护身符，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极权社会的尖锐批判。

无论是在艺术还是道德层面，我们都应该向他们致敬。

**[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景凯旋编译，花城出版社，2010 年 5 月，26 元。**

图 2 为 丹尼洛·契斯



## BOOKREVIEW 书评

### 作为景观的田园

特约撰稿人 言一 (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在川大的宏文书店看到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被置于新书架的显眼位置,起初颇有些吃惊。转念之后方才恍然:这大约与成都城市建设的新口号有关。于是想起在老家高速入口处看到的那幅宣传画来。金碧辉煌的现代建筑构成了城市的天际线,碧绿的田野在城市建筑之下铺陈开来,乍看上去竟也有些赏心悦目。可瞬间涌起的,却是强烈的不信任与荒谬感。

看多了当下的地产广告,早已对上面的文字与图片一概免疫。这幅宣传画亦不例外。所谓的荒谬感则是来自于:在眼下的大陆,有人能想象农田与城市高楼如此地贴么?首先,市民与农民的管理就将成为一个问题。而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还在于:为何无人去到城市的街头,农村的集镇,市郊的山区,随意地找人问问——在你想象中的田园城市是怎样的呢?换言之,面对这一场自上而下的造城运动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既然是田园城市,为什么只能是城市人的田园城市,而不能是农村人,山区人的田园城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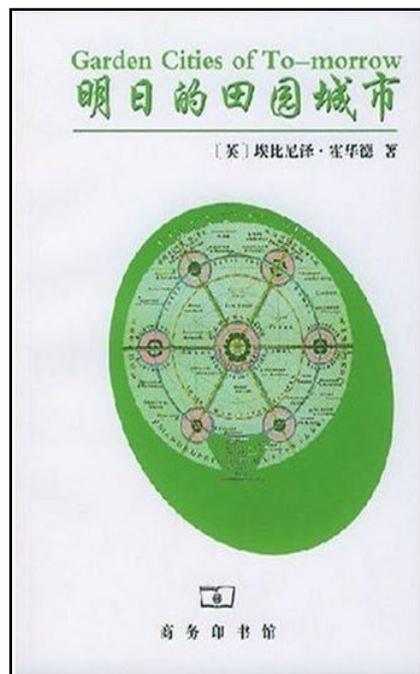
就霍华德原著的书名来看,田园城市=garden city。一方面,这意味着从城市史的角度讲,花园(garden)本源自对乡村景色的模仿,源自人对贴近自然的向往;另一方面,却也是一种暗示:花园为人造(artificial),是一种非自然的折衷;而这恰恰是田园城市的来源——乡村与城市的联姻。这一点在《明日的田园城市》第一章便被开宗明义地阐述得无比清晰。

只是,正如商务版《明日的田园城市》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霍华德的思想和在一个世纪前出版该书第二版时就遭遇了外界的扭曲与表征化借用。在第一版时,书名原本为《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直到第二版时才在田园城市协会的竭力主张下改头换面(改动包括书名,封面,插画)为如今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也正是从这一刻起,“田园城市”,成了一种运动,成为了霍华德思想的代名词,以一枚时尚词汇的身份开始了自身意义的漂流。对此,霍华德本人表示无能为力只能保持情绪稳定。

如果单就霍华德对田园城市物质层面的构想而言:“田园城市建在 6000 英亩土地的中心附近,用地为 1000 英亩,占 6000 英亩土地的 1/6。城市形状可以是圆形的,从中心到边缘为 1240 码(约 3/4 公里)。6 条壮丽的林荫大道——每条宽 120 英尺——从中心通向四周,把城市划成 6 个相等的分区。中心是一块 5.5 英亩的圆形空间,布置成一个灌溉良好的美丽的花园;花园的四周环绕着用地宽敞的大型公共建筑——市政厅,音乐演讲大厅,剧院,图书馆,展览馆,画廊和医院。其余的广大空间是一个用‘水晶宫’包围起来的‘中央公园’,面积为 145 英亩。它有宽敞的游憩用地。全体居民都能非常方便地使用”。这样的规划,与 19 世纪初期的工业集镇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顶多算是规划更为人性化,更看重居住环境的工业集镇而已;而其中透露出的对规划中理性的看重,倒是让我想起后来的柯布。

但这样一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理解显然忽略了“霍华德提案”中的政治家气度。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霍华德新概念的基础和创意。要指出的第一点是在田园城市中,分割开的土地并不为私人所有,必须由公共机构来控制它如何开发,由于田园城市而引发的增值必须保留给社群。霍华德不仅试图消灭私营业主,他还抗拒了为了提高土地价格而增加密度的诱惑。他同样消除了由于土地使用中非理性和投机变化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第二大重要的特征是受到控制及限制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在霍华德的方案中设置了环绕着每一个田园城市的城市发展外部界线,以永远保留开阔的乡村,用作农业或者休闲用地。这条农业带不仅作为绿色围墙以抵抗其它社区的蚕食,而且在眼前就存在一个不错的市场,它有可能为当地生产食品。”(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p432)

不论是霍华德最初的书名,还是从芒福德的评点,都以一种明晰的方式告诉我们:在“田园城市”之构想中,最为重要的乃是作为基石的制度设计与制度改革。然而,不论是当时的英伦,还是眼下的大陆,“消灭私营业主”一说都显得十分大逆



不道。对此，霍华德本人自然有所觉悟，在《明日的田园城市》的第五章一开头便解释道：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消灭私营企业，关键还是在于看哪些事情社区能比私人做的更好。这一解释初看上去颇有几分凯恩斯学派的风骨，但其社区(共同体)的制度设计构想却是实实在在地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欧文与傅立叶。



在我看来，对于霍华德所提倡的田园城市而言，社群与共同体无疑是理解其构想的关键词。霍华德在构想中对于社群与共同体的倚重，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经济下个人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作为一种现象)对城市生活的伤害——我自己亦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柯布西耶在城市规划上对于(集体)理性的强调。但他却并未就此选择走向大一统的计划体制，而是再一次地折衷，选择在城市，甚至局部(社会城市的局部)城市的范围内来构建一种共同治理下的社群/城市空间。为此，社群或共同体内的公共组织必须成为运营管理田园城市的主体。

然而对比大陆现状，荒谬而讽刺的事实在于，这样的主体在大陆的城市恰恰是缺席的。(这一点，只需要看看大陆城市居民在面临旧城改造和 removal，农人山民在面临圈地移居时的无力就能明白。)田园城市在物质的层面究竟如何规划或设计并不真正由城市的居民或者任何将居住其中的人来决定，依旧是一如既往的自上而下。由是，不论最终的规划目标被冠以怎样的称谓，大陆城市规划的本质却是从未改变，进步或改良亦是无从谈起。

从而，田园一词，作为一个形容词(adjective)，更多地指向了景观的层面，而与具体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关。在我老家的山区：山间通往景区沿途的农家已接到通知将逐步地全部被拆

除，以留出最为纯粹的山区景观供“游客”(城市人?)享用，山民则被政府统一迁至某地安居。我曾去到这些统一的定居点，其房屋的设计完全脱离山民的生活实际，让人无法圈养家畜，亦不方便务农。这等于是变相地在逼迫山民去过一种“现代化”的城市/镇生活。其中的种种不便，恐不足为城里人道也。

不难想象的是，当这样的规划最终成为现实，进入山区的人们(城里人)将再也见不到山里人日常生活的场景，吃不到山里农家特色的鲜美食物，更不用说什么芒福德所期待的提供当地农产的市场。眼看着一切的一切都在形容词属性的口号中“被”推进，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框架下日益沦陷，却依旧无人去问：农之不存，田园焉附？

【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元。

图2为埃比尼泽·霍华德

## OBITUARY 逝者·范用

### 小学生的公共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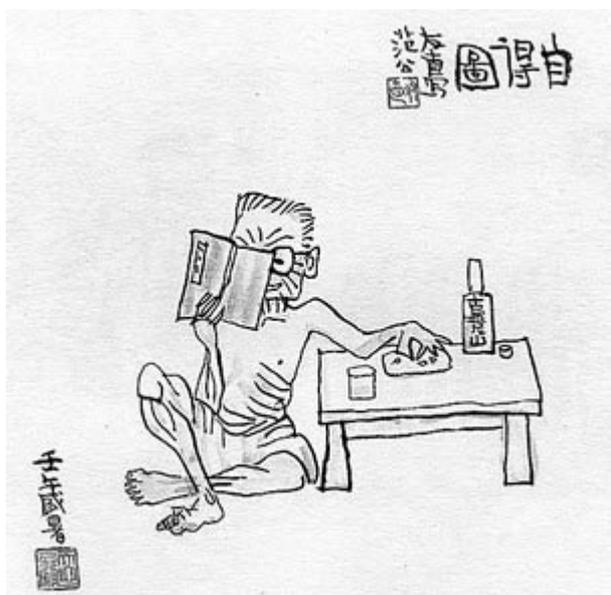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9月14日，范用先生逝世。出版人大都是幕后英雄，不被外人所知，默默无闻已是万幸，一不小心成为“幕后黑手”，有理也说不清了。范用先生在公众中的名声有限，但是他冒着成为“幕后黑手”的风险主持出版的巴金《随想录》、《傅雷家书》等，已经为公众耳熟能详，他参与创办的《读书》，曾经领风气之先。

《读书》创办之初，编辑以高中学历者居多，所以有“几个高中生编了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之说。有意思的是，领导

几个高中生的是一个小学生，范用的简历上写着“小学毕业”，他曾经透露，有时为了好看一点，也会写中学肄业。

作为出版人的范用，值得尊敬；作为小学生的范用，则让人感到亲切。他在《我爱穆源》里回忆的镇江穆源小学，和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里回忆的无锡荡口镇之果育学校，都让人惊叹，原来我们有过这样的小学。



穆源小学是范用先生的母校，因为经常搬家，他五年级的时候才转入这所学校。时间短暂，却一往情深，半个多世纪后，范用先生从三联书店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仍然念念不忘穆源小学的生活。

范用先生回忆，校门左边是校长办公室，“有时，校长笑眯眯站在门口，看同学们上学”；礼堂里有一架钢琴，“钢琴不上锁，不用担心小朋友损坏它”；教员宿舍住着校长和教员，闲暇时间，小朋友们“到老师房里去玩，看看老师书架上有什么好看的书报杂志，房间里传出笑声、歌声、口琴声，校园里多了一分欢乐的气氛”；操场东边的葡萄，“小朋友谁也不摘，等它熟了，变紫了，那时收下来，老师同学大家都能尝到几颗，甜到心里”。

小朋友的素质这么高，是因为学校的生源特别好？经过特别筛选？事实并非如此，在范用的回忆里，转入这所学校，似乎并不需要严格的入学考试。这种其乐融融的景象，让我想起黑柳彻子在《窗边的小豆豆》里回忆的巴学园。黑柳彻子之所以进入

巴学园，是因为在其他地方被老师视为不可挽救的学生，不得不转学。

在穆源小学，小学生有着多样的公共生活。范用和同学们自己办了一个图书室，编号、做卡片、借书填单，程序非常规范，学校的图书馆在假期不开放，他们的图书室却照常运行。国难当头，穆源的小学生成立儿童剧社，进行公演，演出收入全部捐献给绥远抗日将士。巴学园同样如此，学校会举行露营活动，让小朋友们带着帐篷、毛毯和睡衣，在学校的礼堂进行露营，小朋友们互相“串门”，拜访同学的帐篷，校长给孩子们讲在外国旅行的故事。

公共生活不能等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集体活动。虽然今天的校园不乏各种集体活动，但往往是老师指导、学生参与的由上而下的活动。范用参与的活动，虽然有老师的指导，但学生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回忆办墙报的过程，“开头请老师指导，做个样子，以后就由我们自己动脑子，自己动手”。他们自办图书室，与学校的图书馆由学生管理有关，一套规范的程序通过这种实践获得。他们成立儿童剧社进行公演，穆源小学创办人杨公崖先生鼎力支持，支持的方式不是在演出之前上台讲话，而是写张条子，让学生去取演出需要的幕布、灯泡。

在集体活动中，往往是学生贯彻老师的意图，老师提出要求，学生负责执行。集体活动的结果是学生越来越离不开老师，如果哪次老师没有指导，学生立即混乱一团。学生对老师的指导颇为反感，又离不开这种指导，一旦他们成为老师，对学生又会复制这种关系。但是在公共生活里，学生和老师在平等的，互相协商，老师的任务是为学生创造条件，不是设置障碍。比如小学生们要成立儿童剧社，校方不是以安全、学业、没有经费、没有空间为由进行阻止，而是充分提供各种保障。在公共生活中，学生成为独立的个体，同时又养成与他人对话、合作的习惯，形成各种共同体。

有一个细节不仅是巧合，穆源小学、果育学校、巴学园都是私立小学。以个人的力量创办学校，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教育，这本身就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些学校里，小学生的公共生活特别丰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事实上，不管是公立小学还是私立小学，学生都应享有公共生活，可惜这在目前，只是一种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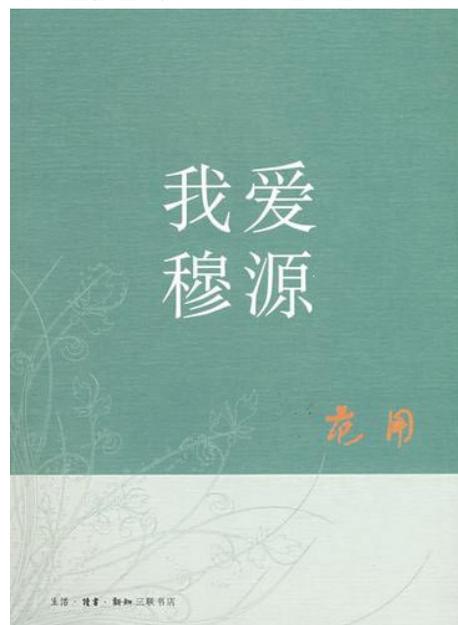


图1为贺友直绘范用像

## ESSAY 随笔

### 书的故事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 (上海, xiayouzhi1997@gmail.com)

“国家正趋向一场巨大而带有实验色彩的变革。政府体制已威风扫地，这一方面因其未触动专制的一根毫毛，在另一方面则是因其极其无能。”



别太敏感了。这不过是阿克顿勋爵对英国政治的讽刺，距今已经有 142 年——如果我们仍然觉得针砭时弊，说明他发现了人类政治生活中非常老套的一面。作为 19 世纪英国最有名的政论家，阿克顿勋爵有许多了不起的发现，比如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中国文化对权力尤其是强权的态度，有崇拜和恐惧两种，第一次听到阿克顿勋爵这样尖锐的断语，几乎能够颠覆一个人此前形成的世界观。阿克顿勋爵的发现从此盘旋在我们头脑里，隔三差五地为现实所证实，直到我们被这种重复折磨得麻木不仁。

重复让波澜起伏的性感美女变得平淡无奇，让一首好歌像口水一样乏味；假 LV 多了，真品就不太不好意思上街，这都是接受心理学上常见的情形。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反向运用这一原理，发明了极权政治的洗脑术，其秘诀仍然是重复——他的名言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在今天的世界，蹊跷的、违反常识的乃至残暴的事情，如果一再发生，人们即便不至于将其当作真理，但也失去了究竟的勇气，只好自认习以为常了。

也许是见多了各地政府为一个网帖不惜跨省追捕的壮举，谢朝平被山西渭南警方抓走的时候，我以为他也是一位网友，结果发现他是位非常传统的作家。他的传统主要表现在自己掏钱印书这件事情上，说明他是传统印刷业的拥趸——当然，这也和他的读者群有关。《大迁徙》这本书写的是三门峡水库移民 50 年来的人生悲剧，书中写到的人群至今生活在从地质到制度都不稳定的故乡，互联网技术甚至没来得及在他们中间得到普及。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活化石，如果不是谢朝平被渭南警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走，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知道有这群人的存在；他们和印刷业一样，将迅速被新时代、新技术和新生活所淘汰、遗忘。

三门峡水利工程本身是巨大的错误，不管是水利设计还是决策程序，都站不住脚，这一点在今天已有公认。但在当年，谁反对修建大坝，就会被看作“政治不正确”打入另册。水利专家黄万里的人生噩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这个另册上又添上了谢朝平的名字。阿克顿勋爵认为历史是我们理解现实的工具。这话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加以解释：既然三门峡水库证明打击言论自由的做法危害无穷，政府今天就应该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但识时务的人们不但不这样想，还认为正解是：有了黄万里的遭遇，谢朝平就不应该写这本书。

书这种东西，不过是一堆纸，作用因人而异。对谢朝平来说，是赔本赔到了家的买卖，但对渭南政府而言，是抓人的好

由头，另有些地方，被政府看作是是一条发财之道。安徽省有五个地市在开学前临时更换初中学生的教材，导致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没书可念。听说这事的时候，我正和一位在出版社发行教材的朋友吃饭，就向他请教此事的诀窍何在。他于是告诉我一些教材发行的惯例——其实不说我也猜得到，用东北人的话说，这事“地球人都知道”，无非是教育部门不恰当地利用了手上的权力。事情就这么简单，问题是谁——想必应该有一个或几个像黄万里、谢朝平一样有名有姓的人——做的决定？媒体就此事采访教育部，该部发言人磨叽了很久，兜了很大的圈子，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她其实可以直接说“无可奉告”。所谓发言人的难处，大家很能理解，但实在是太不环保了。

从做事不留名的角度来看，即使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绝对的权力”，也往往显露出怂蛋的一面。这样的事情实在不胜枚举。8个月前，三家行业协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悍然通过一个文件，规定出版一年之内的新书不准打折销售。这三家协会虽然只是民间团体，但想来是很沾了不少主管部门的官气，制定起文件来非常霸道，准备一举取消图书发行市场的自由定价权，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实在是颀颀到了极点，所以现在不得不删掉相关规定。但8个月里，从来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敢出面对此负责。

智者对权力的批评是建立在逻辑上的，而权力打击自己的批评者时，有一种对具体人和事的偏好。黄万里、谢朝平都是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但我们不知道是谁发动、主持、实施了对他们的打击报复，不知到他们的姓名。我们知道写书的人，不知道禁书的人。50年来对批评者的肉体和精神打击，足以让其他潜在的批评者望而却步，却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这种长久有效的制度偏好让人害怕，因为其最糟糕的后果是我们失去了革新政治的动力。

图为三门峡水库建设场景，摄于1960年前后。据新华社报道，水库于1957年开工建设后，移民累计达30万人。

## MUSIC 音乐

### 切尔卡斯基轶事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huiyuanma@gmail.com](mailto:huiyuanma@gmail.com)）

(一)



今天在图书馆里闲逛看见一本钢琴家切尔卡斯基（Shura Cherkassky, 1909-1995）的传记，《舒拉·切尔卡斯基——最后的钢琴沙皇》，不由好奇地拿来看看。这位生于乌克兰的大师，我略有了解，印象最深的是过去在某处访谈中读到的他的一套练琴之道。其实，这类演奏浪漫派的大师，在那个时代实在太多了。上个世纪中有那么几十年，钢琴演奏艺术达到顶峰，天才们都在变着花样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如今这类音乐听多了，还真有些审美疲劳--难怪后来的古尔德，要坚决和浪漫大师们划清界限。不过，大师的人生和求道之途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上个世纪的欧洲，有盛世、乱世和战争（比如 Maria Hess, Georges Cziffra 等等，人生都贯穿了战争或逃亡）。繁华荣耀和悲惨调成一锅粥，手眼通天的天才也是命运的玩偶。

和很多大师一样，舒拉也是神童出身，四岁学钢琴就显露出天赋，七岁时就偷偷写了部歌剧，八岁时开始写管弦乐。他九岁时在家乡首演之后引起轰动，著名男低音夏里亚宾说，“这个孩子听上去好像经历过所有的情感。”话说音乐真是神奇，能激发出“不可能”、“未存在”的东西。不过，神童这个现象在竞争激烈的演奏界，还是会引来许多争议——那时，欧洲有那么多真正的钢琴家、真正的神童（事实上成才的人，

几乎无人不是神童，只是未必都早早巡演而已），但神童的损失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很多大师对神童并不感冒。“神童太多了，多数什么都成不了”。这是俄国钢琴家帕赫曼的话。他后来勉强同意来听舒拉，立刻被征服，这是后话（类似的故事在成年后的舒拉身上上演：他也拒绝去听“神童”弹琴，但破例听了巴伦博伊姆，最后“他开始弹第一个音符的时候”就被深深打动了）。总之，前辈教导舒拉要少演出。喜欢他的帕德雷夫斯基说可以收他当学生，条件是每月上台不超过两场。拉赫玛尼诺夫干脆要求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完全退出舞台生活，专心学习，尤其是学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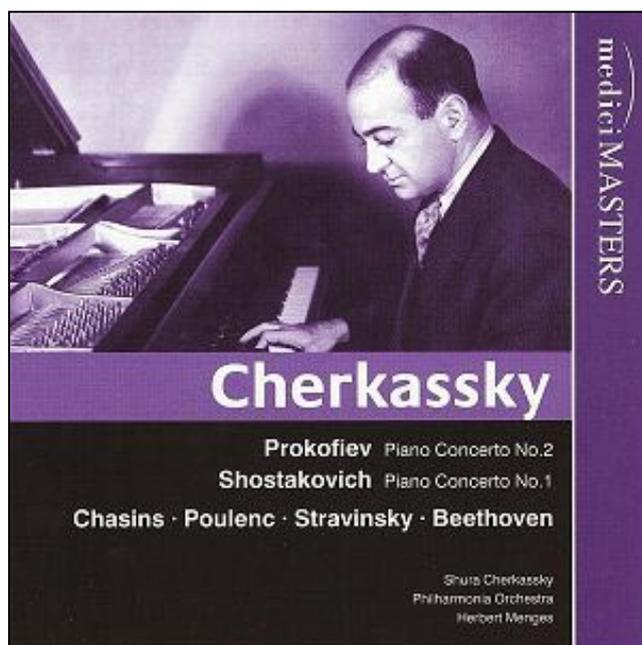
最后舒拉和父母移民美国，并选择了生于波兰而移居美国的霍夫曼当老师。而霍夫曼不仅曾经是五岁登台的神童，对语言、数学甚至机械都有很高天赋，终生获得了 60 多种发明专利，从汽车部件到钢琴部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2 岁左右，霍夫曼到处演出，一年多之内排了八十场，累得发烧，一位富有的慈善家克拉克（Alfred Clark）匿名提供给他父母五万美元（其中一万美元作为结束音乐会合同的赔偿），条件是让他退出舞台，直到 18 岁！这件慷慨之举，多年之后才被人们知道。而霍夫曼听话地退出了舞台——虽然长大后咕咕啾啾，说小时候明明可以多开些音乐会的。

我读到这里不由十分感动。富人赞助艺术家，并不太稀奇，但只有少数赞助是从长远考虑、真正为艺术着想的，其中尤其罕见的是这一桩，以“希望你不再演出”的方式，保护天才的成长。我一时好奇，搜索这位克拉克先生的资料，原来他善举很多，一向不喜张扬。他因继承遗产而富有，后半生则致力于赞助艺术，据认识他的人说，“他几乎是为别人而活的。”

话说舒拉 16 岁时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接着随霍夫曼学习。当时柯蒂斯的赞助人主要是波克（Mary Curtis Bok）夫人，她的父亲是柯蒂斯学校的创始人。当初柯蒂斯只是一所帮助移民安顿的小学校，教音乐是为了“帮助外国移民的孩子接受美国理念，成为好公民”，但在波克看来，实践得不理想，因为很多有音乐天分的移民孩子无力深造。她索性投入了更多的钱，买下大楼，请霍夫曼来当钢琴系主任。

波克夫人长期供给舒拉奖学金和巡演欧洲的费用。不过舒拉一直抱怨钱不够花（因为父母没工作，靠他一人的奖学金），要求涨钱，提供旅费，说“我穷得连鞋都买不起。”据传记作者分析，当时他拿的奖学金，相当于现在的年收入近四万美元，三个人不至于活不了。而留下的信件，都是切尔卡斯基坚持要钱的，波克夫人则有时拒绝。

还有，波克夫人似乎从未建议或催促他想办法自己去挣钱，比如教学生。舒拉一直不喜欢教学生，只靠巡演来挣钱，一开始并不顺利，至少没有在美国获得迅速的成功，又不会理财。同样受到大萧条干扰、收入下降的波克夫人也没有勉强他，总是尽力支持。看上去，舒拉当时真像个受宠的孩子，而波克夫人对他充满赞扬，满口都是“我们丝毫不怀疑你有个伟大的前程。我们为你而自豪。”这样无条件的慷慨和善意，在当时似乎形成了传统和责任。当年，波克夫人的母亲把钱留给丈夫，丈夫认为自己不需要，于是留给唯一的女儿，期待她继续慈善事业——柯蒂斯音乐学院至今大名鼎鼎。



1935 年，舒拉离开了霍夫曼，开始了独立的演奏生涯。此时他已经开始在美国获得声誉，也开始了旅行演出，被邀到俄国、法国甚至中国——不过他在美国的全面成功，是在五十年之后。在这段时间，挫折并不少，一场音乐会后的恶评就能让他痛苦得失去信心。钢琴演奏尽管是一种相对单纯的事业，但钢琴家是人，总难免和他人打交道，而公众的反应，并非天才可以控制。天才一旦进入生活，往往也要委曲求全。许多当年霍夫曼的学生都退出了舞台，钢琴家的浮沉就是如此。

为什么成功如此之慢？部分原因是，当时霍洛维茨、鲁宾斯坦、阿劳都在美国演出，尤其是霍洛维茨和鲁宾斯坦，压得他喘不过气。而和他同样级别的天才也很多，比如博列、怀尔德、克莱本，大家争夺着有限的资源和演出经纪人。有趣的是，一生谦逊低调、严于自律的舒拉，对霍洛维茨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后者是被许多评论者责为虚荣、卖弄和肤浅的。你看，大师之间龙虎相克，和评论家的逻辑并不一致。

1940 到 1945 年，舒拉陷入困境。因战争故，音乐会约不到，钱又不够花。此时，连恩师霍夫曼也有很多问题，不时染病，自顾不暇。波克夫人在给舒拉的信中说，“现在任何事情都是赌博，没有人能随时正确地预测。你只能做可以做的事情。”她后来在给霍夫曼的信中说，“我简直要被舒拉这种（指要钱）信淹没了。”

毕竟还是坚持下来了。在美国、法国、波兰这种地方没有机会，他在挪威、丹麦等国开了不少音乐会。其间还有这类事情：急需钱的他，却拒绝了鲍德温钢琴公司的约请，一定用斯坦威。渐渐，经纪人们对他更头疼了，虽然大家都承认他的演奏是超群的，但他的不通世故让人无可奈何。1941年左右，他沦落到只能给有钱人在客厅里弹琴来挣房租了。还是波克夫人送来 20 美元供他租斯坦威。后来斯坦威慷慨地让他免费用琴，波克夫人让他把这小笔钱留用。然而他仍处在困境中，常常抱怨“我们下顿的饭钱不知在哪里。”有时舒拉说“你去年明明许诺过我……”然后波克夫人拒绝，舒拉坚持，再写，最后波克夫人大概叹了口气，给了他要的七百多美元。此时霍夫曼老师也开始资助他，他母亲也开始教钢琴补贴家用。而他仍然保持着一项奢侈的美德：不肯跟经纪人圆通，也不肯宣传自己。波克夫人始终没有强求他。

日子就这样过去。在艰难维持中，可以坚持的仍然是不休的严格练习。舒拉已经三十多岁了。这个小个头、害羞、早早谢顶的家伙，有时生病、有时酗酒，但能坚持每天练习四小时。这是和霍夫曼学习的时候定下的规矩，他简直当作宗教仪式来坚持。后来，他回忆起那段时光，对自己并不满意，包括在艰难中的表现，但好歹坚持下来了。“这样的经历对我是很大的好处。我目睹很多人在艰难中自暴自弃，但我很自豪，有个批评家曾经这样说，切尔卡斯基是幸存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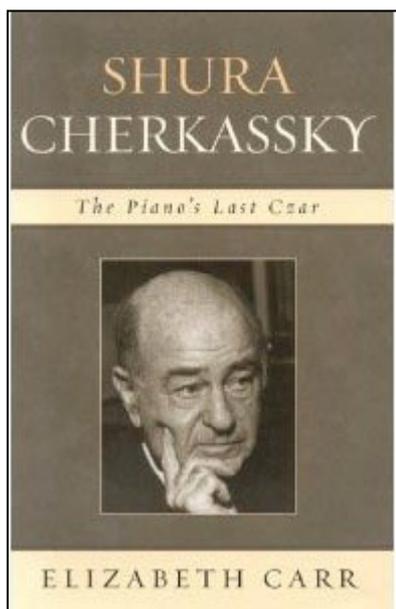
战后，一切都在改善，包括获得越来越多的经纪人“人脉”。舒拉渐渐靠广泛的曲目以及不取消音乐会的美德、随时处在备战状态，能顶替突然取消音乐会的人，才重新获得成功。他以强大的体力活跃下去，弹到八十多岁。虽然因为不喜欢录音，他的 CD 不多（基本都是现场演奏），但其中确实有很多惊人的声音，比如巴赫-布索尼的《恰空》，他弹得比别人慢，但因格外沉静、紧实而不凡，有钻石般的光芒。我在其中并没察觉明显的即兴和随意性，倒是深感他精雕细刻，只有其中 *tranquilo* 的一小段，有种繁华轻落的飘逸。在我个人看来，即使他在这类大师中并不显得十分独特，但至少这首《恰空》会让他流芳百世——而这并不是他最好状态时期的录音。音乐总是遗憾的艺术。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他同样慢得让人惊讶，好像仔细剥开了一些段落，让人看清内部的纹理和伤痕。这曲子他当然上台多次了，事实上，他自己也曾担心太慢，不过斯特拉文斯基曾经说，“是鲁宾斯坦弹得太快了。”而如今的演奏家，大多弹得飞快，舒拉几乎成了异数。据我手中这张 CD，是 1991 年他在卡内基大厅的现场。八十二岁的人，在音乐中融化于毕生唯一的情人——钢琴。

舒拉是同性恋，终生对感情讳莫如深。

(二)

舒拉的练琴方式颇值一谈。

他的秘诀，包括铁打不动的练琴纪律，除了“每天四小时”原则，他还坚持每天都从极慢和中强开始，有清楚的计划。



每天都有确定的时间花在某些段落上，而且每天坚持同样的方式，每个音都要把手指摆在琴键中央。他说过，这样不变的练习，是为保证不出错音：即使手指偶然从习惯的位置偏离，也不会碰到别的音。“我练琴的时候，总是好像第一次读到乐谱。我每次都在音乐中发现新东西，哪怕已经弹了七十年。我总是寻找探索音乐的新方式，比如不同的踏板、指法或音色。很可能有些曲子我弹了十二年，突然发现，‘天，这样的指法更好。’或者我常常在和声中发现新东西。永远有无限的东西可以学。”他还说，有个方法可以觉察钢琴家的衰退——听他的和弦。有人无法准确地把手指放在琴键中间，所以和弦不够干净。这一点在听他自己的演奏时很明显，确实很少有人能把和弦弹得这么深透（即使在快速进行的时候），并时时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些和声板块的移动和挤压，为音乐生就深渊和天空。

舒拉练琴的时候一般不让人听。“有人在一旁听的话，我会很尴尬，因为他们可能以为我压根不会弹琴。”调律师默尔有一次恳求舒拉允许他旁听，舒拉说，“听我练琴可是世上最枯燥的事。”后来默尔回忆，舒拉在练习中弹得极慢，音阶都让人听不出，每次集中练习一个手指。而管弦乐手们有类似的回忆。晚上要上台，而在上午的排练中，舒拉还在用“一半音量”来排练，不了解他的乐手看着这个个子小小、触键轻轻的家伙，简直哭笑不得，不知道他会不会弹琴！而晚上的演出中，舒拉突然神采飞扬，爆发出电闪雷鸣的声音。

像很多浪漫派钢琴家一样，他不屑讨论音高、和声感觉对音乐的细腻影响，更看重演出中的灵感；他不喜欢分析，说什么那么多音乐能力远不如他的人，试图分析他的演奏。似乎，他的精神是从底层操作和倾听之下的矫正直接抵达的，越过

了对音乐的抽象思辨。这一类演奏者，从大师到天才青少年都有不少，他们依靠对旋律、和声趋势的自然感知来歌唱。钢琴这件强韧、宏亮的乐器和多彩的浪漫派音乐，为这类人提供了表达的空间。

谈及音乐，他总是强调自由表达以及抵达“自由”的手段。他最喜欢的状态就是，开始弹的那一刻，还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不可预测”和“没有两次演出弹得完全一样”是他自豪的品质。但这不意味他刻意追求奇特的表达。事实上，是技术的全面控制和条理分明得近于僵化的练习给了他表达的自由。说到充斥热情的演奏，这也许是浪漫派音乐的宿命——它们令隔世的记忆爆发其间。深入音乐的钢琴家，必然会在这种激发之下唤起个人体验，在音乐中填充想象和野性。而在舒拉身上，激情澎湃的演奏的背后，是耐心观察并粉碎乐句的漫长积累。这样刻板的练习，他人未必要躬行，但不断寻求有效方式、同时获得音乐性和准确性的练琴思想，也许对今人不无启发。

此外，这一批浪漫派钢琴家中，如霍夫曼、帕德雷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等，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个性而不是对音乐的考古能力和分析成果，所以他们的曲目中极少有古典音乐家如海顿和莫扎特。因为这类作曲家没有提供足够的动态，发挥不出他们的长处。而舒拉也很少弹古典作品，但却比较少有地，弹了巴赫、拉莫和吕利，尽管相当多时候，是弹这些作品的改编曲。当然，在舒拉的时代，由于音乐学和对早期作品的挖掘成果还相当有限，他的演绎并未在现存录音中夺得非常重要的位置。但他的曲目之广可见一斑，根本原因是，舒拉自己说，“我爱的是音乐，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某个作曲家。”他说自己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德彪西。

不止一位钢琴大师被冠以“最后一位浪漫家”的称号，舒拉是其中之一，和他难分高下的钢琴家名字，还有很多。“最后一词也许并不合适，因为毕竟浪漫派音乐如今仍被演奏。但他们的盛年，无疑是“前录音时代”，“前钢琴比赛时代”，调性音乐仍然为鲜活的个人精神欢呼。而那个时代的古典音乐既激励心灵，又和财富、荣耀、上流社会的势力紧紧相连。

不敢说更喜欢哪个时代，我只感激钢琴家们的饱满心灵记录了浪漫时代的“遗嘱”。

*Shura Chermassky: The Piano's Last Czar*, by Elizabeth Carr,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illustrated edition edition (January 12, 2006).

图 1 为舒拉·切尔卡斯基

## TALK 访谈

### 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

——再访周有光

北方朔

特约撰稿人 贾葭（北京，[jjjia80@gmail.com](mailto:jjjia80@gmail.com)）

灵子（北京，[lingzi0815@gmail.com](mailto:lingzi0815@gmail.com)）

今年七月的高温与其他种种新闻相同，都是多年不遇。白花花的阳光大片大片洒在柏油路上，让人唇干目眩。再次敲开周有光老先生的家门，他仍然坐在那张掉了漆的小书桌前，与寒冬季节拜访时一样，笑咪咪等着来客发问。

他大概并没弄清楚来人是谁，也不多问，但显得很欢迎，已脱落眉毛的眉骨在眼睛上方明显弯起来。仿佛他已习惯了这样的模式，接受各个领域的问题，尽力给出自己一百零五年生命里思索出的答案。

早年他曾参与大英百科全书的编纂译介，晚年倒果真成了“周百科”。来来往往的人在这九平米的小书房里一再驻足，期求于此寻得焦灼生命中的一片清凉。

不许讲缺点，是我们缺点中的缺点

问：您最近关注什么新闻？

周有光：最近看到三大新闻，一是悟本堂，一是富士康，一是假博士。我们国家在毛泽东时代搞得很乱，后来改革开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社会要搞坏容易，搞好不容易。根据我的体验，许多不合理的荒唐的事情在八十年代一直慢慢地改，一直改到九十年代才差不多了。九十年代以来这十年我们发展也快得不得了，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有好的政策，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中国人素质还是好的，文明古国嘛。可是文明古国常常要丢脸，刚刚三个新闻都是很丢脸的事情，说明文明不够文明。



这个情形不是今天才造成的，新中国六十年里前三十年都是破坏，破坏得太厉害，带来许多问题。这是奇怪的，所有国家在发展当中都会产生问题，发展越快问题越多，好多东西都是利弊共生，这是社会发展当中的一种规律。

问：假博士的问题您是什么看法？

周有光：这是一种道德水平的下降。中国人的传统是诚信，孔夫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很重要的。现在到处是假的东西，甚至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是抄人家的文章，这种社会风气非常不好。这个事情应当说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发达了，但媒体还没有充分的自由，报道还有顾虑。一有顾虑，就会造成一种起哄的风气，就不是思考了。

这个事情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苏联瓦解以后我们没有彻底批评苏联。新中国样样都是学苏联的，这两天我还看了一本李锐写的书，分析毛泽东很深入。毛泽东说他是秦始皇+马克思，李锐就说，实际上是秦始皇+斯大林。俄罗斯本身批评得非常深入，但是一方面他们的知识分子在批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要维持、发展俄罗斯，要恢复大国主义，就捧斯大林，甚至于在教科书里面把他与俾斯麦相提并论，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

最近我看到国外一篇评论，说俄罗斯现在经济好起来了，因为天然气、石油涨价了。可是这个好对俄罗斯的影响长远来看是负面的，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想创造了。这样一个大国家到今天没有农业，很好的田都荒着没有人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常常到中国来，他就告诉我，在俄罗斯要做农民的人，要多少田就给你多少田，但还是没有一个青年想做农民。另外，没有民生工业，他们穿的衣服、家里的家用电器，都是买中国的，又骂中国商人真坏，把坏东西卖给他们。中国商人卖的的确是便宜一点的东西，因为他们购买力不行。它的对外贸易政策也是不合理的。一方面我们搞俄罗斯年他们搞中国年，一方面他们把几万中国商人都赶走了，不许外国人在俄罗斯做小生意这种消息我们都不大报道。最糟糕的就是对俄罗斯的坏处我们不报道，造成我们有很多阴暗面不能改正。

现在我们还是转型时期，发展水平来看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的GDP很高，因为人多嘛，加一块四个美国还不止，可是人均GDP很少，所以我们还是一个穷国家，其它方面也是。我们的风气不太好，新闻报道常常吹得很厉害，从国际水平来看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坏事情都会慢慢变好，但是乐观不等于喜欢坏事情。我认为坏事情应该很严重地批判。有一个故事，好几十年了，有一个日本人住在韩国几十年，年老回国之前写了一本书，把韩国一棒子打死，把坏事情讲出来。想不到这本书出来之后一下子卖了几十万部，起哄得不得了。韩国人自己跟着他揭露坏的事情。这个新闻上海《解放日报》报道得最多，总题目是韩国不怕骂，国际上都评论，一个国家不怕骂才有希望。我们今天就不许讲缺点，这是我们缺点当中的缺点。

**问：现在太多的事情不能批评，对舆论控制越来越严。在您看来，如何才能使政府消除对舆论开放的恐惧？**

**周有光：**这个事情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怎么走民主道路。这两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要有开明水平，二是群众对于民主的认识和要求。李慎之提出“回归五四，学习民主”，这八个字我觉得很有道理。民主是要学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制定许多法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定了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就是承认私有制。从历史来看，不是私有制落后于公有制，进步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不丹这样的小国家都走民主道路，不是群众要求，而是头头们到外国留学去了，有了新的思想。很多小国家都是这样实现民主的。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或许你们早就知道。沙特阿拉伯非常保守，它的王子王孙都到英国留学，回来之后看不惯本国的状况。老国王死了，新王子接班，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电视，新国王要求发展电视事业，大臣们都反对，说这是魔鬼的诱惑。王子说好吧，你们都回去吧，下次再谈。大臣们走出王宫，发现汽车没有了，回去问王子。小王子说，汽车也是魔鬼的东西，你们要它干吗？哈哈。后来电视就办成功了。

伊斯兰教是最保守的，女人要戴黑布罩子。最近的新闻说，不是由于外部力量，而是现在很多伊斯兰国家人民自己要把手面纱拿掉。所以要想进步，认识是很重要的，能认识它是对的，就很容易取得进步。另外一方面，不能单靠群众自我提高，要靠有水平的人出来提倡。

### 什么东西都要走世界性的道路

**问：可是现在出来提倡的人往往都是没水平的，比如悟本堂的闹剧。**

**周有光：**悟本堂的事情有几方面。第一方面，社会上的欺骗多得很，因为欺骗是没有罪的；第二方面，人民群众当中还有很多人知识水平太低，绿豆汤怎么可能治百病嘛。

你仔细看的话，中医的广告许多都是假的，堂而皇之。中医里面当然有好的东西，它是民族传统医。不仅中国有，有名的还有印度、蒙古、阿根廷传统医。西医是把传统医里面的东西经过科学验证研究，把它提高了，作为科学医当中的构成部分。我们的中医没有经过这样的系统化。比如药物的名称，中医里各地的名称就不能统一。你要发扬传统文化，一定要用科学方法整理传统文化，这是最重要的。你要用科学医来整理旧的中医，而不是像这样拼命吹。

我不是反对中医，是提倡中医要科学化。科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科学的一元性，科学不分东西、没有中外，科学都是一元性的，世界通用的。很多传统的东西没有经过验证，应该慢慢进行这个过程。现在好像不让你科学来，说自己什么病都能治，是新方法，其实就都是中医的老方法。这个问题记者也有一定责任，有时候跟着他们走，缺少批评。

**问：现在有两个东西不让批评，一个是中医，一个是武术。**

**周有光：**不让批评都是错误的。中国的武术是有它的特点，但如何发扬？运动方面的比赛最高级别的是奥运会，奥运会以前是没有羽毛球的，这是印尼他们搞出来，后来提高水平，经过国际认证，就变成世界性的了。中国的武术应该走这条道路。什么东西都要走世界性的道路。你另外搞一套，不让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是不行的。

**问：那么汉字呢？现在电脑输入拼音已经很方便了，书写难度几乎已不再是恢复繁体字的障碍，所以台湾不少人呼吁恢复繁体字。**

**周有光：**要恢复繁体字是不可能的。马英九反对台湾搞另外一套拼音，赞成用我们的拼音，这点事情他做对了。可是他要提倡繁体字是不对的。蒋介石也是提倡简化字的，公布简化方案，是南京第一个做的。不过那时公布以后，反对的声音太大，第二年就失效了。所以蒋介石到了台湾还在提倡简化字。但是我们是搞简化字的，台湾是共产党搞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结果就反对简化字了。

我讲老实话，这个反对是他们文字学发展水平不足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许发展文字学。这样子他们就落后于我们。我们在文字学、语文工作上面一直还不错，这不是共产党不共产党的原因，清朝末年就开始了。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得慢慢地做，因为这不是容易的。比如提倡普通话，原来叫国语，名称是无所谓的。原来很困难，到了九十年代普通话的提倡基本成功了，一方面是慢慢的积累，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发展方向没有搞错。现在有些批评，是因为凡是共产主义提倡的他就反对，这跟文化工作本身是两回事。我现在不跟外界往来，以前有台湾的学者过来我就跟他说，语言文字我们从学者的方面来解决，

学者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不要把它跟政治混在一起。

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许用繁体字嘛，一种古文字当然要学，还有人学甲骨文呢，而且学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不要古的，只要今的。以前有人提倡要厚今薄古，我是提出厚今而不薄古，厚今是重要的，可是古代不要丢掉，古代的好东西不要丢掉。

**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天天希望你否定它**

**问：这段时间媒体爆出道士李一利用“神仙法门”大发名人财的事情，为什么这种明显立不住的说法也能欺骗那么多所谓精英？能否请您谈谈与之相关的信仰缺失的问题？**

**周有光：**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说亚洲人创造许多宗教，欧洲人创造许多主义，这都是信仰。可是从信仰宗教到信仰主义，是前进了一步了。因为信仰宗教，那是一个想象，毫无根据的。主义是有哲理的，是哲理信仰。可是还有第三步，是进步到科学。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评它，哪天你能创造一个推翻它的理论，那你就了不起了。一个民族多数人的思想会经历三个步骤，神学思维，就是信仰宗教；玄学思维，就是各种主义了；科学思维。科学的好处是希望人家骂，你骂不倒它，它就是真理，所以它站得住。而且科学全世界是一样的，是一元的，宗教不同的教派，主义不同的流派，都是不同主张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多的时候有40个国家，现在只剩下6个，这说明更多的人在往科学方面走了。

当然，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有些问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可是整个趋势是毫无疑问的。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这三步的发展非常重要，你能掌握这个规律，观察很多事物你就明白了。

**问：这么说您认为宗教相对来说是落后的？**

**周有光：**从科学的角度玄学是落后的，从玄学的角度看，神学是落后的。苏联是没有思想自由的，所以它就反对宗教嘛。它搞很大的运动，就像马克思说的，宗教就是鸦片烟。结果苏联一垮台，大家都跑到教堂里面去了。什么道理呢？外国评论提出一个观点，它拿不许怀疑来反对不许怀疑，当然是失败的。因为苏联搞得这一套还是玄学，不是科学思维。从这一点来看，叶利钦这个人还是有眼光的。在欧洲有人问，你把苏联搞垮了，你懊悔不懊悔？他说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前进的必要条件。

现在之所以那么多人选择宗教，很容易解释。他们有种精神的苦闷，人不仅要物质的生活，还要精神的生活，他们精神没有寄托。讲老实话，我们今天还是一个专制政体，许多人会发生精神苦闷，有一部分人就想用宗教解脱自己。我自己也有过经历，我是教会学校出来的，一直不信教，但是抗日战争中我有一个七岁的女儿盲肠炎死去了，因为打仗的时候医院条件不好。这个给我的打击很大。那时候来了一个朋友，是冯玉祥的秘书，他娶了基督教太太，也信了基督教。他说你精神痛苦，可以有一个安慰的方法，可以受洗礼入教，我就跟着他五分钟受洗礼，吃一块小小的面包就完了。但是对我来讲，我是一个理智主义者，真正让我信教很困难，要我每天吃饭祷告就办不到。所以我形式上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真正相信。一个有深入的科学思维的人要成为真正的教徒是很难的。

前几天有个东北来的朋友来，说现在东北信教的人很多，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现在人信教多是信基督教，基督教在许多宗教里面比较是最进步的。当然，它有它迷信的一面。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不同的地方在于，不仅认为天上是很美的地方，同时要在地上建立很美的人的国家。（此处删去若干字——编者按），基督教是帮助社会发展的，美国现在许多有名的学校都是教会大学。

**问：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对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有什么借鉴作用？怎么理解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光与真理”？**

**周有光：**可以这样说，现在世界的教育，主要都是基督教教会办起来的。欧洲比较古老的大学有六百年，都是教会主办，几乎没有例外。所以宗教的迷信与迷信里面产生的思考、真理，就是所谓的辩证法。先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里生产出来的，都是慢慢变成了先进。现代教育发展了六百年，或者从两千年的整个教育史来看，教会推进教育、推进科学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基督教为什么能这样子呢？它经过了宗教改革，前后闹了差不多五百年，之前教会腐败得不得了，很多荒谬的事情，后来一步步改革。原来天主教是保守的，新教三大派是比较进步的。改到现在，天主教也是比较进步的了，与新教没有多大分别。从这个社会来看，是从黑暗到光明的，是从落后到进步的，是从愚昧到智慧的，要一步步前进。什么叫进化论的思维？进化论是了不起的，不仅用之于自然现象，也可用之于社会科学。我们今天在于自然科学已经没有问题了，苏联一度

自然科学都不要，要创立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后来都失败了。我们今天引进了自然科学，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只引进了经济学，其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想将来会慢慢开门的。

### 我讲的话你们不要相信

**问：现在兴起民国热，民国题材的书籍很畅销。感觉民国时期文化很繁荣，您的文化功底也是在那时打下的。您怎么看现在兴起的民国热潮？**

**周有光：**我想民国热有它合理的一面，有它不合理的一面。合理的一面，现在全世界有一股历史学热，国外的讲法叫做全球化历史学。比如香港杂志就讨论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谁发动的？大家都说是德国发动的，但并非如此，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共同发动的，他们定了密约瓜分波兰，瓜分欧洲。一个国家发动和两个国家发动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全球化历史学是要把历史重新结构，中欧许多国家最起劲。中国历史也在改变。比如太平天国，过去国民党捧太平天国，因为它反对满清；共产党捧太平天国，因为它是农民革命。现在知道这两个看法都错了，太平天国是非常落后的，给中国带来很大破坏，不是好东西。特别是《辞海》，以前说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成了天平天国运动。所以假的、错的历史要改正过来，这是国外目前很流行的历史新动向。

现在重新想起有一个民国时代，是对的。可是错的呢，是另外一方面。许多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是专制的，共产党是宣传民主的。这是共产党一直这样宣传的。现在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不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有党派都参加了反对日本人，重要的党派头就做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就是副主任。那时我在重庆，周恩来每月开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我每一次都参加的。周每次都讲，我们共产党是要走民主道路的，所以青年都左倾，反对国民党。但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否定国民党，把许多对的事情也否定了，现在慢慢在改。改得比较重要的，比如朝鲜战争，我们一直说是美帝国主义挑起的嘛，现在都讲了，是北朝鲜挑起的。所以不仅是民国时代，所有历史上错误的东西都要纠正过来。司马迁了不起，他的历史观念是比较客观的，所以《史记》到今天还是了不起的东西。这些东西要从今天全球化历史学这股风里面来看，有对的一面，也有观点错误的一面。

**问：民国时期您在新华银行工作，这是当时有名的私有银行。现在国内的金融基本上还是政府控制的，这个要不要改善？**

**周有光：**解放前中国跟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国民党是要走资本主义这条路的，同时国民党是亲美国的。共产党相反，搞社会主义的，向苏联一面倒，完全不一样。当时银行主要是两种，国家有四个银行，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主要是国家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民间的。其他都是私营银行。那时候上海是经济、文化中心，有四个银行是私营银行里比较有水平的，叫四小行。新华银行是当中一个。

那个时候中国什么都要学美国，美国尤其是银行业最发达，中国上海的银行业跟美国差别很小，水平很高的，那时我们已经进入支票时代了，现在人家都不懂什么叫支票。解放以后我们改学苏联，苏联的银行业是最糟糕的。最近二十年改了很多，应该说进步很快。所以人家都说中国没有银行了，只有账房。账房老板开了条子以后可以拿去，银行没有这个事情。银行是个很复杂的机构，糊里糊涂的事情是没有的。后来银行业搞得一塌糊涂，经济也被破坏。我们也是到了九十年代慢慢上轨道，可是从技术上面讲，今天还是跟美国差距比较大。

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嘛，银行都是国家的。我们也有几个私营银行，但也是国家统治的，而且也是不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开放两个字，新加坡这样小的地方有一百多个外国银行，情况很不一样。

现在我觉得大银行由国家统治，同时发展民间银行，这个政策是对的。但也要开放外国银行到中国来办分行，这个现在控制得太严格了。这不是什么利害的问题，银行是像水一样，你一个坝拦住了，水流就不畅，对我们的发展也不利。

我是瞎讲的，因为都是瞎看，年纪大了不能出去参加活动。所以我自己都不大相信自己，因为我的消息不是正常渠道接受的，说不定很多事情不知道，看到一点就算一点，过糊涂日子。

**问：您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都是什么？**

**周有光：**电视是每天晚上都看。但我的耳朵不好，装了助听器能勉强听听主持人的话，里面的讲话很多听不清，所以看电视不能百分之百接受信息。我看的新闻哪里来的？本国的报纸，比如我觉得我们的《参考消息》还是很好；香港的报刊，解放前我们家就住在香港的，香港的朋友常常来，或者寄东西过来；还有美国寄英文刊物来。主要是这三个方面。我的眼睛

倒没有问题，还可以看。

网络我也接触。我书房里有一个小打字机，可以写中文和英文的，大电脑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但网络我比较害怕看，眼睛看久了那个大屏幕受不了，而且行数太多，看着有点眼花。所以有大量的东西我就去看，没有就不大去看。平时在网络上面找东西都是保姆代我做。

最近没有怎么写东西，因为有点小毛病，老年人腰痛，要休息几天。我前两天去看医生，说这个是老年病，没办法，其他都还算健康。

**问：您这么长寿有没有秘诀啊？**

**周有光：**长寿有秘诀，很简单。第一条，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可以喝点啤酒。第二条，生活要正常，许多人的健康搞坏，就是自己搞坏的，没有按照科学道理来。第三条，不要生气，度量要大。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他好的一面，坏的一定会慢慢过去。一方面等它自己变好，一方面也要做工作帮助它变好。有的事情要快一点，可是快不了。

**问：那现在您觉得什么问题是最着急解决的？**

**周有光：**这二十年进步最多的就是经济方面。我们的经济是外包经济，而且是以低廉的劳动作为基础的，所以水平还是太低。不过这已经是很好的起步了。我们改革开放在政治方面没有开放，现在有些消息说要开放，我也不知道对不对。2017年香港特首和立法委员可以直选，这就是好消息，当然，慢了一点，呵呵。香港直选也会影响中国。我是看不到了，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

我的话你们不要相信。这不是讲客气的话，因为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当然怀疑不是胡乱怀疑，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独立思考。所以苏格拉底了不起，他的教育就是一句话：知道你自己。

图为周有光先生近照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网易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